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律资讯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题）

2024 年 第四期

本期编辑：罗海溧 毛闻博 潘金骏 唐康萍



上海市律师协会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目录

一、法律政策速递..... 1

 （一）《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 1

 （二）法规解读 8

二、理论研究动态 11

 （一）《论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改进》 11

 （二）《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倡导及其实现》 28

三、各地司法实践..... 40

 （一）《在虚拟世界里保护“少年的你”》 40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区委网信办、区市场监管局、区文旅局执法大队） 40

四、典型案例分析 43

 1.检察院依法监督 43

 2.法院依法裁判..... 45

一、法律政策速递

（一）《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

法发〔2024〕7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新时代新征程，全社会更加关心少年儿童的全面健康成长，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民法院肩负更重责任、面临更大挑战。为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防治工作，切实提升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总体要求

1. 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政治高度，谋划推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防治工作，牢固树立新时代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理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以依法能动履职促推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六大保护”融合发力，为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营造良好法治和社会环境。

2. 基本原则

（1）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始终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发展需求放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首位，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结合未成年人成长和身心特点，依法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名誉、隐私和各项实体权益、诉讼权利，在各阶段各环节落实“特殊、优先、双向、全面”保护理念，全力维护和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2）坚持一体融合履职原则。深化刑事、民事、行政“三审合一”综合审判改革，强化系统思维，坚持综合保护，同时关注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权益维护、刑事犯罪预防惩治和公共利益维护，突出问题导向，健全工作机制，携手各方，实质性解决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推动事后救济保护向事中、事前预防治理转变，构筑全链条、全方位、立体化的未成年人保护网络。

（3）坚持案件办理与促推治理并重原则。依法公正高效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确保案件办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在案件办理的同时，深入研析案件反映的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以更加有效的司法保护促推“六大保护”贯通融合、协同发力，坚持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做实源头治理、系统治理。

（4）坚持守正创新原则。针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新情况新形势，深入总结涉未成年人司法规律，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有利于强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防

治的新机制新方法。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相结合，全面推进涉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年司法制度优势转化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综合效能。

二、加强涉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

（一）加强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审判工作

3. 增强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防治观念。着眼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防治，积极探索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方式，在民事、行政审判中要关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善于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化解、消除可能滋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各种消极因素，做实“抓前端、治未病”。

4. 建立涉未成年人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开辟“绿色通道”，本着便捷、高效的原则，对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民事、行政案件，实现优先立案、快速审理、及时裁判、高效执行，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5. 加强教育和诉讼引导。围绕保护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办案中注重从法律规定、社会道德、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等方面对未成年人、监护人等相关人员进行针对性教育和诉讼引导。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等案件中，切实做好“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引导当事人以保障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为目的，妥善处理抚养、探望、财产等相关事宜。

6. 做实做细调解工作。民事案件除身份关系确认等不适宜调解的以外，应当重视调解。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邀请社会观护人员、未成年人的近亲属、学校、街道、居委会、村委会等参与案件调解。行政案件应当积极开展诉前调解。对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应当在审判过程中注重通过调解实现最佳办案效果。

7. 及时指定诉讼中的代理人。在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与其监护人存在利益冲突的，人民法院可以及时告知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协商确定未成年人的代理人；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在他们之中指定代理人。未成年人没有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民法典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有关组织担任代理人。

8. 合理确定直接抚养人。对涉抚养案件，未成年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充分听取其意见，尊重其真实意愿。未成年子女向人民法院表达意愿或者陈述事实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社会观护人员或者其他合适人员在场陪同。陪同人员可以辅助未成年子女表达真实意愿。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单独询问、听取未成年子女意见，并提供适宜未成年人心理特点的友善环境，确保其隐私及安全。未成年子女表达的意见不利于其身心健康成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释明，并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进行裁判。

9. 妥善审理探望权案件。对于探望权案件，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应当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写明探望时间、方式等具体内容。不直接抚养一方因外出务工等原因不能

见面探望的，人民法院可以引导当事人积极通过电话、书信、网络、视频连线等方式给予子女亲情关爱。

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应当依照协议、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调解确定的时间和方式，在不影响未成年子女学习、生活的情况下探望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的一方应当配合，拒不协助的，人民法院可予以教育、训诫，直至依法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探望不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当事人请求中止探望的，人民法院在征询双方当事人及未成年子女意见并查明事实后，认为需要中止探望的，依法作出裁定。未成年子女请求父母探望，或者祖父母、外祖父母请求探望孙子女、外孙子女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依法裁判。

10. 妥善审理涉未成年人侵权案件。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人民法院发现监护人未正确履行监护职责的，根据情况对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教育指导。

未成年人的人身权益受到侵害的，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发育、成长和康复需要，依法确定赔偿费用。对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器官功能恢复训练等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参照成年人案件适当提高。

11. 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财产权益。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当注意审查当事人拟分割的财产中是否包括未成年子女的财产以及是否已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分列，防止当事人违法处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未成年子女存在重病等特殊情形的，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应以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依法处理。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和受遗赠权。

12. 强化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人民法院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行政行为，应当严格进行合法性审查，防止行政行为侵犯未成年人权益。对于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及时予以纠正。监督和支持教育、公安、民政、网信等相关部门依法履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

13. 强化行政许可与处罚审查。在涉及未成年人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案件中，关注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况和权益保护需求。对涉及教育、卫生等领域的行政许可，应当确保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和健康权得到充分保障；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行政处罚，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行为特点，避免不当处罚。

14. 加强行政争议诉源治理。对事关未成年人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措施出台、政策制定或调整、敏感事件处置等事项，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参与论证、提供法律咨询意见、发送司法建议等方式，助推涉未成年人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从源头减少、杜绝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政行为。

15. 积极探索创新执行工作机制。探索由专门团队或专人负责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执行工作。对涉抚养、探望等执行案件，积极开展教育疏导、调解等工作，引导当事人以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为原则，主动履行义务或者达成和解。

（二）加强涉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

16. 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精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准确把握和判断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导致犯罪的深层次原因等，最大限度挽救涉案未成年人。对于主观恶性深、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特别是屡教不改的，绝不姑息纵容，坚决依法惩治，确保司法公正。

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采取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方式，坚持“寓教于审”，根据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和犯罪行为等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庭教育，剖析引发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和教训，引导未成年被告人正确认识法庭审判的严肃性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促其改过自新。

17. 从严惩处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行为。引诱、指使、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从重处罚。特别是对于胁迫、教唆、引诱、欺骗未成年人参与实施黑恶势力犯罪、有组织违法犯罪的，利用未成年人介绍、诱骗其他低龄未成年女性卖淫或者供其奸淫的，利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留守儿童、在校学生实施犯罪的，以及通过向未成年人传授犯罪方法、提供毒品、管制麻醉精神药品、灌输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继而加以利用等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的犯罪，依法从严惩处。

18. 从严惩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对于拐卖、拐骗、绑架儿童，暴力伤害、性侵害未成年人，引诱、介绍、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制作、贩卖、传播含有未成年人内容的淫秽电子信息，向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犯罪，坚持零容忍立场，依法从严惩处。

19. 加强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障。人民法院审理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被害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易受伤害等特点，给予特殊和优先保护，强化对其权益的保障。应当将案件进展情况、案件处理结果及时告知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并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确定案件开庭日期后，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宣判后，应当将判决书向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送达。

（三）做深做实涉未成年人特色审判工作

20. 深化未成年人隐私保护。对审判时被告人未满十八周岁的刑事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对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涉及个人隐私的，应当不公开审理。对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不得向外界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以及可能推断出未成年人身份的其他资料。查阅、摘抄、复制的案卷材料，涉及未成年人的，不得

公开和传播。对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行政案件，应当注意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发布案例、制作法治宣传资料等均应当对相关信息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

21. 深入开展社会调查。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详细了解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和犯罪成因。对人民检察院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及有关人员提交的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情况的书面材料，应当重点审查是否客观、全面地反映了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监护情况、学校教育、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以及其他反映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深层原因的内容。社会调查报告不具体、不翔实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予以补充，也可以自行或者委托有关机构开展社会调查。对社会调查报告和有关人员提交的相关材料，经出示、质证，依法采纳的，可以作为办理案件和教育被告人的参考，以及向有关方面提出司法建议的依据。庭审中，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作出调查报告的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接受控辩双方和法庭的询问。

22. 积极完善社会观护。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抚养、收养、监护、探望等民事案件涉及未成年人的，可以委托从事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工作的社会组织或者人员就未成年人相关情况开展调查、参与案件调解、必要时陪同未成年人接受询问、对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判后延伸观察保护等社会观护工作。社会观护员可通过分别听取当事人、未成年人意见和走访街道、社区、幼儿园、学校等方式，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的实际生活状况。社会观护报告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及开展司法延伸工作的参考和依据。

23. 积极开展心理疏导。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根据案件情况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自行或者聘请专业人员对未成年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和矫治，安抚未成年人情绪，消除、化解未成年人心理危机和心理障碍；经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也可以对未成年人进行心理测评，心理测评报告可以作为办理案件和教育矫治的参考。应当及时为未成年被害人及遭受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提供心理疏导。

24. 加大救助力度。根据未成年人的实际困难，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未成年人优先救助，在救助力度上给予倾斜。积极与教育、民政、共青团、妇联等部门、社会慈善机构等建立联动关爱救助衔接机制，对确有需要的未成年人予以经济帮扶、转学安置等帮助，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三、推动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三审合一”实质化

25. 完善一体化审理机制。因同一事实或者相关事实产生的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互涉案件，在符合法律有关管辖规定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原则上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对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反映出的涉未成年人行政管理、犯罪预防等工作中的突出问题、隐患，或者审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发现未成年人民事权利等也受到侵害的，应当一并依法妥善解决、处理。刑事或者行政生效裁判确认的基本事实，除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外，在相关民事案件中可予以认定。

26. 做好线索移送和权利告知工作。审理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探望权纠纷以及撤销监护人资格等案件，发现未成年人受到或者疑似受到虐待、暴力伤害、性侵害、遗弃等违法犯罪侵害的，应当将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移送主管部门处理。审理行政案件

发现未成年人民事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告知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涉嫌违法犯罪的，将线索移送主管部门处理。审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涉嫌违法犯罪的，或者发现其他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线索的，将线索移送主管部门处理。

27. 做好刑民衔接。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但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或者因已超过刑事追诉期限等客观原因无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符合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或者其他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但尚不构成犯罪的案件，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赔偿范围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确定。未成年人在宾馆、酒店、歌厅、酒吧、网吧、电竞酒店、剧本娱乐经营等场所或者互联网平台受到性侵害等伤害，相关场所、平台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未成年人以此为由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赔偿范围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确定。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者人民法院保存的与被诉侵权行为具有关联性的证据，侵权案件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申请调查收集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可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程序的除外。

28. 建立公益诉讼衔接机制。人民法院发现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涉及公共利益的，可以将线索移送检察机关。应当注意发现涉案未成年人食品、玩具、用品等是否危害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全面审查涉案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网站等网络技术、产品和服务以及图书、广播电视、影视传媒等是否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对未成年人保护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是否存在不作为、乱作为等损害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情形。

四、促推“六大保护”融合发力

29. 依法引领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人民法院应当在审判中强化父母等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引导监护人尽到抚养、教育、保护的义务，创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家庭环境，不仅要为未成年人提供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还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妥善审理申请确定和指定监护人案件，确保未成年人有人监护；妥善审理申请变更监护人和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确保未成年人得到妥当监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依法判令监护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0. 强化家庭教育指导。人民法院审理涉及留守未成年人、困境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案件，或者离婚、抚养、收养、监护、探望等民事案件涉及未成年人的，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诉前调解、案件审理、判后回访等各个环节，通过法庭教育、释法说理、现场辅导、网络辅导、心理干预、制发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家庭教育指导建议书等多种形式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人民法院在审理涉未成年人刑事、行政案件中，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存在其他因家庭监护管教缺失、不当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情形的，根据情况，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31. 依法从严处理学生欺凌。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件中发现存在学生欺凌现象的，应当与学校或培训机构及教育主管部门沟通，建议及时予以严肃处理，并跟进处理进展。未成年人因学生欺凌等行为遭受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欺凌行为的强度、持续时间以及对被侵害人身体、心理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各方面因素，依法判决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充分发挥赔礼道歉的修复、抚慰、诫勉功能和作用，探索通过诉前调解等方式，促使实施学生欺凌的未成年人真诚赔礼道歉。学校、培训机构等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依法判决承担侵权责任，并根据情况发送司法建议。欺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2. 妥善处理校园纠纷。人民法院审理校园纠纷案件，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依法妥善化解矛盾。积极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维权，坚决依法惩治各类“校闹”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未成年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发生人身损害，学校已经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依法判决学校不承担侵权责任，为学校依法依规开展教学管理提供司法保障。

33. 加强法治副校长队伍建设。积极选派政治素质过硬、法律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有宣传教育特长的业务骨干担任法治副校长，明晰工作职责，严格工作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之间的长效联络沟通机制和常态化的信息反馈机制，提升法治副校长履职实效。

34. 及时提出专门教育的建议。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发现未成年人具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行为，应当进行专门教育的，可以向相关部门提出建议。

35. 建立犯罪成因逐案分析报告机制。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逐案深入剖析案件背后是否存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及司法保护薄弱、不到位等情形，并形成报告附卷，评议案件时单独予以说明。发现有关单位未尽到未成年人教育、管理、救助、看护等保护职责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向有关单位发送司法建议；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将相关线索移送主管部门处理。

36. 建立“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情况分析报告机制。对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案件，应当逐案审查相关国家机关、居委会、村委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是否履行了强制报告义务，并形成报告附卷，评议案件时单独予以说明。对存在应当报告而未报告情形的，应当及时发送司法建议；对涉嫌违纪或者违法犯罪的，及时将相关线索移送主管部门处理。

37. 建立相关场所法定义务落实情况分析报告机制。对发生在宾馆、酒店、电竞酒店等场所的涉未成年人案件，应当审查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时，是否履行了询问未成年人年龄、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联系方式、与共同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的义务，相关场所是否设置了相关标志等，并形成报告附卷，评议案件时单独予以说明。发现存在问题的，应当及时发送司法建议；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将相关线索移送主管部门处理。

38. 建立网络保护专项分析报告机制。对涉及网络的未成年人案件，应当结合案件成因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律规定，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建立协作机制，对相关主体是否履行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定义务进行审查，并形成报告附卷，评议案件时单独予以说明。发现存在问题的，应当及时向有关网络企业、主管部门发送司法建议；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将相关线索移送主管部门处理。

39. 提升法治宣传教育的系统性针对性。加强与学校、教育主管部门等的沟通协作，积极开展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法治宣传教育，坚持严肃性与可接受性、知识性与趣味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强化以案释法，创新宣传形式，教育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不断增强规则意识、法治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对辖区法院发布涉未成年人刑事典型案例的审核、监督、指导，确保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五、加强组织保障

40. 加强专业化建设。严格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确定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门人员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负责未成年人犯罪防治工作，加强“三审合一”审判团队建设。充实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力量，融合推进队伍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建设。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人员应当经过专门培训，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热爱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加强专职辅助人员配备，协助审判人员开展未成年人延伸保护工作。健全符合未成年人审判工作规律的评价激励机制。

41. 加强协调联动。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协作配合，建立常态化的会商协作机制，统一涉未成年人案件证据、数据标准，共同做好教育、感化、挽救和司法救助等工作。加强与政府职能部门、共青团、妇联、学校、基层组织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的沟通协作，建立健全信息共享通报机制。推动完善政法机关未成年人关爱帮教工作衔接机制，探索建立包括社工、志愿者、“五老人员”等在内的未成年人司法关爱帮教人员库。

42. 加强工作条件保障。积极争取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对未成年人审判设施建设、开展社会调查、社会观护、心理疏导、法治宣传、家庭教育指导等特色审判及延伸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办案经费范畴予以充分保障，确保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有效开展，全面提升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防治能力水平。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spLxgT6UyPsY8ui5Q0qXtg>）

（二）法规解读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始终把这项工作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惩处、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也是人民法院积极参与国家治理、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的必然要求。为积极适应未成年人保护新形势新任务，全面提升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防治水平，最高人民法院制

定出台《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于5月30日正式发布。

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及合法权益被侵害案件时有发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人民法院坚持问题导向，在惩防并举上下更大功夫，以能动履职融合、贯通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等涉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防治工作。经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制定了这部司法文件。《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突出体现新时期做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防治的新理念、新思路、新要求。《意见》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等原则，积极探索适合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的审判、工作方式、制度机制，夯实对未成年人的关爱保护；树牢前端预防犯罪理念，坚持厚爱严管、管早管小，细化、压实家庭、学校、社会、网络等关爱、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及时化解、消除可能滋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者被侵害行为的各种消极因素。

《意见》共分五个部分计42条，分别从总体要求，加强涉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推动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三审合一”实质化，促推“六大保护”融合发力，加强组织保障等五个方面，对当前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防治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和要求。《意见》主要特点：

一是抓前端、治未病，高度重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要求积极探索适合未成年人心身特点的审判方式，关注未成年人心身健康，善于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化解、消除可能滋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各种消极因素，做实“抓前端、治未病”。在审理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以及涉及学校保护民事、行政案件中，把未成年人心身健康成长放在更重要位置予以考量。例如，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抚养、探望等民事案件中，做实做好“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引导当事人保障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减少因家庭变动对未成年人的不利影响；对实践中矛盾争议较多的离婚案件中如何确定抚养权，明确了尊重未成年人意愿原则；对未成年人被侵害案件，要求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点，确定赔偿费用；对实践中监护人和未成年人存在利益冲突时，规定可以为未成年人指定诉讼代理人，更好保障其合法权益。

二是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强调精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准确把握和判断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导致犯罪的深层次原因等，最大限度挽救涉案未成年人。对于主观恶性深、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特别是屡教不改的，绝不姑息纵容，坚决依法惩治，确保司法公正。例如，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坚持“寓教于审”，根据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和犯罪行为等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庭教育，促进其改过自新；对未成年人被操纵、利用实施违法犯罪等案件，更加突出对组织实施犯罪成年人严惩导向；对性侵、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等案件，坚持零容忍立场，依法从严惩处。

三是刑事、民事、行政一体保护，全面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建立“三审合一”审判机制，贯通刑事、民事、行政一体追责机制，建立线索移送机制、刑民衔接机制、公益诉讼衔接机制，充分整合审判资源，促进纠纷一次性解决、源头治理。对因未达

到责任年龄等种种原因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侵权案件，依照民法典确定赔偿范围；对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甚至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对宾馆、酒店、电竞酒店等场所及互联网平台违反法定义务，对诱发未成年人犯罪或被侵害存在过错等案件，细化相关主体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督促相关主体切实履行保护未成年人和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职责，确保涉及未成年人的问题有人管，被侵害权益的救济途径畅通无阻。

四是促推“六大保护”融合发力，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通过引领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从严处理学生欺凌、妥善处理校园纠纷等促推家庭保护与学校保护不断落实。通过构建犯罪成因逐案分析、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情况、相关场所法定义务落实情况分析报告机制和网络保护专项分析报告机制，促推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将相关工作举措，由“可选项”变为“必选项”，不仅对相关案件逐案分析，还要在评议案件时加以说明，以此加大司法履职力度，从关注事后追责惩处向事前事中事后保护、预防并重转变，有效避免“小错”酿成违法犯罪、轻微侵害演变为犯罪侵害，为未成年人构筑全链条、多层次、见实效的防护网络。加强法治副校长队伍建设，加强与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等的沟通协作，积极开展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法治宣传教育，强化以案释法，创新宣传形式，提升法治宣传的系统性和针对性，突出规则意识、法治意识、责任意识，教育、引导广大未成年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保护未成年人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人民法院将以本次《意见》发布为契机，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以能动履职促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落地落细，促推“六大保护”融合发力，以过硬举措遏制滋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各种因素，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spLxgT6UyPsY8ui5Q0qXtg>）

二、理论研究动态

（一）《论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改进》

（作者：何波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 副主任）

2023年9月，国务院审议通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对网络保护制度进行了体系化的再造，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从内在结构看，该体系由纵向体系的三大法律层级和横向体系的四大制度单元精巧衔接、有机耦合而成，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促进等制度单元基本涵盖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主要领域。在生成机理上，该体系以化解网络风险为逻辑起点，以最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为主要原则，坚持自然亲权与国家亲权相协调，最大化发挥技术治理手段的保护功能，并以网络平台为重心，推动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网络问题的多方共治。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在施行中取得了显著的保护成效，实现了以体系化法律制度应对体系化网络风险的目标，但仍未臻完善，主要体现在法律规范衔接互动还存在不足，部分制度施行存在效果偏差等方面。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应强化保护理念，完善配套法规，调试制度适用，寻求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最优的处理方案。

一、引言

自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未成年人就是中国上网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互联网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入网终端设备的广泛普及，未成年人网民规模不断增长且持续扩大，逐渐成为网络用户中的重要力量，网络空间也成为保护未成年人的新领域。截至2023年6月，中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1.91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6.8%，超过五分之四的未成年网民拥有属于自己的上网设备。互联网在给未成年人生活、学习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改变了其成长的外部环境，带来了未成年人安全合理使用网络的意识和能力不强、网上违法和不良信息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个人信息被滥采滥用等问题，这些问题亟待通过立法等方式予以制度性解决。在近三十年的网络法治建设进程中，中国始终将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作为互联网治理和网络空间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立法机关采取渐进式的法律体系构建模式，先后制定了多部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建立起了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保护”章节为核心，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多个法律层级，涵盖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促进、网络信息内容规范、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和网络沉迷防治等各方面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为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制保障，也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这一国际重要议题上，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的智慧和经验。

网络风险具有天然的体系化特征，无论是从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还是网络空间治理的角度，要想实现对未成年人网络空间的全面有效保护，就应构建一个系统性的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2023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该条例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作为中国第一部专门性

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对网络保护制度进行了体系化的再造，标志着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二、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内在结构

体系是一个科学术语，泛指一定范围内或同类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不是法律规范的简单拼接，也不是制度规则的机械组合；而是由层次清晰、定位明确的纵向体系和关联互动、有机耦合的横向体系按照一定逻辑构成的法律制度体系。从内在结构来理解和认识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就应该在深入分析该制度纵向体系和横向体系构成要素的基础上，寻求各要素之间的逻辑联系。结合中国立法实践和监管实际，本部分将从纵向体系和横向体系两个维度进行具体解读：

纵向体系的解读是指对不同效力层级的法律文件进行科学的功能定位，从而确保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协调与平衡。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是一个典型的法律规范体系，主要包括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三个层级，同时还包括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同层级的法律文件之间彼此联动，共同形成了纵向的网络保护规范体系：（1）纵向体系第一层级为法律，是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规范体系中最顶层的规定。在法律层级中最重要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新增设立“网络保护”专章，确立了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核心制度框架，成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化建设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还包括两类相关法律：一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互联网领域专门法律，这些法律从网络角度将未成年人纳入保护范围；二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传统未成年人保护法律，视网络空间为规制领域的一部分，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延伸至网络空间。（2）第二层级为行政法规。最核心的行政法规当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该条例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基本制度规则化，进一步充实制度框架，对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化构建具有关键性作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正式施行，进一步夯实了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体系的根基。（3）第三层级为部门规章和地方立法（包括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代表性的部门规章如《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分别从规范未成年人节目、保护个人信息、规范算法推荐等不同维度，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做了相关规定。此外，地方立法是中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方出台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规和政府规章是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规范体系的有益补充。整体来看，网络保护纵向体系是由众多不同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构成的，但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不是杂乱无章的。通过长期的立法和实践，立法机关和监管部门共同推动了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规范体系的形成。

横向体系是指依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的不同细分领域，根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的不同特点，从逻辑上建构出来的一个关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基础制度

体系。从横向来看，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四大制度单元，即：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促进制度、网络信息内容规范制度、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制度和网络沉迷防治制度。横向体系的四大制度单元基本覆盖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主要领域，每一制度单元内部又包含了多个具体网络保护制度，各单元之间通过关联互动、有序配合，共同搭建起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制度网络。（1）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促进制度属于网络保护的前置性措施的基础性制度。未成年人正处在从“自然人”向“理性社会人”过渡的关键时期，网络素养被认为是内嵌于未成年人发展核心素养框架体系中的关键内容。良好的网络素养不但可以增强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技能，而且有助于提升未成年人识别和应对网络风险的能力，降低发生不当行为的可能性。（2）网络信息内容规范制度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核心制度，该制度通过增加有益内容的供给、减少阻隔违法和不良内容，有效降低网络风险，防止风险扩散。目前，中国已经颁布了大量与未成年人网络信息内容规范相关的法律文件，建立了网络信息内容分类管理、适龄提示、特殊领域（广告、教育）内容管理等多项制度规则。（3）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贯穿于网络保护的各环节，具有全局性意义。中国在网络保护中全面建立了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告知同意”制度、未成年人身份认证制度、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制度、合规审计制度以及未成年人私密信息发布提示和保护制度等，形成了全面系统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规则体系。（4）网络沉迷防治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的重点，是引导未成年人合理适度使用网络、防止沉迷成瘾的必要措施。网络沉迷并非个别的社会问题，而是数字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是随着网络新媒体持续普及和广泛渗透而伴生的新兴社会风险。中国立法围绕未成年人易于沉迷的网络游戏、网络音视频、网络直播、网络社交等重点领域制定了相应的制度。

虽然本文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分成纵向体系和横向体系进行分析，但二者之间是无法完全割裂的。纵向体系和横向体系共同构筑了完整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是纵横结合、上下互动、彼此嵌套的，因此也必须以体系化的视角看待具体的制度单元。一方面，网络保护目的的实现往往依赖、横跨多个制度单元，离不开多个制度单元联动配合。例如，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防治不单应依赖网络服务提供者，而应同时通过网络素养促进、未成年人网络活动信息共享、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等全流程全链条监督监管共同完成。另一方面，每个横向制度单元内部也与纵向体系化制度交叉、交融。例如，在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制度单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三个层级都有规定。在法律层面，《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明确了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基本原则；在行政法规层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将“个人信息网络保护”作为专门章节进行规定；在部门规章层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出台了专门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

三、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生成机理

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经历了一个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演进过程，主要目标是化解未成年人面临的网络风险，其中贯穿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坚持自然亲权与国家亲权相协调原则，充分发挥技术手段为依托的法律治理模式，并将大型网络平台作为“管主体”的核心抓手推动多方共治，力求有效解决网络保护的实际问题。

（一）以化解未成年人网络风险为逻辑起点

网络社会属于典型的风险社会，人类在享受互联网发展红利的同时，必须积极和有效应对随之而来的风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得危险和潜在威胁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风险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导特征，风险社会也成为当代人类难以规避的境遇。互联网所具有的时空压缩与时空伸延并存特征，重塑了网络时代的社会结构；而网络空间具备的互联性、及时性、虚拟性等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系统的脆弱性，同时产生放大效应，使得风险传递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网络社会中不确定性快速增长，且使风险成为网络社会的内在构成要素。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应用的持续快速发展，网络社会的风险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呈现出高发态势，即使是成年人在此风险环境中都面临难以有效支配自己行为的困境，更遑论心智方面不成熟的未成年人。虽然未成年人可通过互联网拓展对世界的认识能力，但由于未成年人存在生长发育存在道德体验不足、缺乏选择和自控能力、辨别分析能力较弱等特性，加之网络社会的放大效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弱势状态，未成年人极有可能成为网络风险社会的受害者。因此，在网络风险社会情境下，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立法，就应当重点关注如何更好地预防、控制和化解网络风险，通过法律制度设计更好地限制网络技术应用的消极影响并扩大其积极的影响力。

就逻辑起点而言，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根本目的在于化解未成年人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具体来看，网络保护横向体系的四大制度单元分别针对性地解决了未成年人安全合理使用网络的意识和能力不强、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被滥采滥用以及部分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等问题，而这四大类问题基本涵盖了当前中国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中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例如，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现状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水平呈现总体水平不高的特点。针对这个问题，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明确了网络素养促进制度在网络保护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勾勒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促进的制度框架。《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则设立“网络素养促进”专章，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了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促进制度的具体规定，内容包括：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学校素质教育内容；明确了监护人的网络素养培育责任；规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以及专门供未成年人使用的智能终端产品要求；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的特殊义务等。

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建设，始终注重根据网络社会风险的发展变化而适时做出相应调整，以更好地回应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面临的现实风险，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即PC互联网时代，电脑是接入网络的主要工具，未成年人所面临的网络风险具有点状集聚的特征，网络风险主要集中于网吧

等经营场所，内容主要体现为网络游戏沉迷。因此，立法主要针对未成年人接触网络的关键节点规定相关管理制度，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等，形成了以“管场所、管游戏”为核心的专项网络风险规制模式。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发展开始提速，并迎来高速增长期，智能终端设备大规模普及，手机成为主要入网终端，未成年网民规模进一步增加，网络风险更加多样化，网络保护立法开始转向“管场所、管主体、管内容”的多维规制模式。例如，“管场所”的意涵从传统网吧向更广阔的提供上网服务的网络空间延伸，2016年出台的《网络安全法》首次在网络专门立法中对未成年人保护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再如，针对未成年人接触的网络信息内容范围极大扩展的情形，各有关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制定了《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不同领域的政策法规。当下，随着互联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加速渗透，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深刻改变着网络空间的存在属性和运行状态，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主体更加多元，原有的“碎片化”立法保护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发展需求，立法机关应适时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并增加“网络保护”专门章节，加快出台综合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构建起全面的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系统性回应未成年人面临的网络社会风险。

（二） 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在应对网络风险社会的法律调整中，中国坚持把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贯穿于立法始终，并将其作为制度发展与体系构建的主要原则。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源自国际社会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最初主要适用于收养、监护及抚养等家事法领域，是英美法系家事法的重要理论基础。随着儿童保护环境发展变化和保护理念的提升，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逐渐成为多个国家和地区未成年人立法的基本指导原则和国际公约的基本准则。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儿童权利公约》，在国际法上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进一步推动该原则成为保障儿童权利的共识。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中国在20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次修订时增加“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规定，首次明确了未成年人优先原则，即对未成年人的生存、保护、发展等各项权利，国家和社会都要高度重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将未成年人放在最优先考虑的地位。由于法律本身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尤其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领域，互联网技术更新迭代快、各类应用变化多，当法律和制度相较于保护的实际需求滞后甚至缺位时，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适用不仅能够个案中填补法律规则不完善产生的保护缺失，还能够由点及面，从整体上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的制度发展和体系建构。因此，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提出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并详细列举了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的六项要求，以具体要求的方式保障这一原则得到精准适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不仅是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的一般性要求，也是贯穿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最核心的基本原则。2023年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进

一步规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明确了该原则在网络保护中基本原则的法律地位。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包含未成年人利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等理念，其本质要求是要以未成年人权利为本位，在权衡各方利益时将未成年人的利益放在更加特殊、优先的地位。因此，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的建构也须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旨归，策略上宜疏堵结合，既应防止未成年人因接触网络而遭受负面影响，又应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介带来的资源与发展机会，保障和促进未成年人的成长发展。中国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全程贯穿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9条对新闻媒体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的责任做了专门规范，要求新闻媒体采访报道不得侵犯未成年人的名誉、隐私和其他合法权益。立法在传统合法信息和非法信息分类的基础上，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进一步明确了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并规定了相应的处置措施。

《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对涉未成年人网络信息的内容进行分类管理，不仅是中国网络立法技术的重大进步，而且是全面体现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制度设计。网络信息内容规范是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重要对象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关键问题。《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对于信息内容的规范主要基于“合法”“非法”的“二分法”，但这样“二分法”带来的问题是，在合法与非法信息之间，存在大量虽然不违法但却不适宜未成年人接触的信息内容，如何对这部分处于合法非法模糊地带的信息内容进行规范，是立法长期以来面临的难题。中国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以“分类管理”思路替代国际社会“分级管理”的思路，基于“是否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标准提出了新的“三分法”制度设计，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角度将网络信息内容分为三类，即：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内容（简称“违法信息”）、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内容（简称“不良信息”）和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信息内容（简称“有益信息”），并基于三类信息的分类，匹配了不同的处置措施。2019年出台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首次提出“正能量信息”“违法信息”和“不良信息”的分类方式奠定了“三分法”的基础。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时从“是否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角度确立了“三分法”的监管模式。2023年出台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延续前述立法模式，并对相关规则予以细化，最终建立了以分类为核心的未成年人网络信息内容管理制度。网络信息内容管理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分类制度的设计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利益优先保护的理念，立法在权衡网络空间不同群体利益时，给予了未成年人利益特殊、优先的考虑。特别是不良信息，虽然不属于明确的违法信息，对成年人影响有限，但从未成年人保护角度来看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因此，立法创造性地设计了“提示制度”，要求不良信息在展示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提示。分类管理制度体现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本质要求，如《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相关主体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对于未成年人有益的信息内容，以满足和丰富未成年人网络文化生活。

(三) 自然亲权和国家亲权相协调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涉及家庭、国家、社会、学校等多方主体，但立法对不同主体应有不同的定位。国家和家庭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自然亲权是指未成年人与父母监护人的关系，自然亲权的产生基础是父母与未成年人之间具有的自然血缘关联，具有专属性、伦理性、排他性和不可让与性等身份权利特征。在当代中国相关法律中，自然亲权基本可以等同于《民法典》等所规定的监护权，强调父母对其子女人身及财产的天然教育和保护职责。一般而言，父母是抚育未成年人的最佳选择，因此，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家庭应当发挥首要的作用。自然亲权天然具有基础性地位，但当家庭缺位或者无法有效履行未成年人保护责任时，就需要国家亲权进行补充和干预，以保障、恢复和增进未成年人的利益。国家亲权（*parens patriae*）原则来源于罗马法，目前已成为各国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基础理论。国家亲权意味着国家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最高和最后的监护人，需要以父母的角色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便宜行事。关于国家亲权和自然亲权的协调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绝对自然亲权时期，即国家亲权不干预自然亲权；第二阶段为国家亲权辅助自然亲权时期，国家开始干预自然亲权，但仍以自然亲权为主；第三阶段为国家亲权超越自然亲权时期，国家开始积极地干预自然亲权，可以成为未成年人的最终监护人，负有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职责，在特定情况下可以限制和剥夺自然亲权。国家亲权原则意味着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再仅仅是未成年人父母监护人或者家庭的事项，而属于维护国家利益这一至高层面的事项。

自然亲权和国家亲权是科学实现未成年人保护的两个重要基础，有效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更须实现二者的平衡和协调。整体来看，中国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的过程中，兼顾了国家亲权原则与自然亲权原则，并注重推动二者相协调。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在总则部分同时针对自然亲权和国家亲权提出要求：一方面，明确了自然亲权的基础性地位，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对未成年人承担监护职责”；另一方面，注重自然亲权与国家亲权的衔接，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指导、支持、帮助和监督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无论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都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了具体要求，从法律上确立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与未成年人在网络保护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未成年人保护法》设置了“家庭保护”章节，规定了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积极履行的监护职责和明确禁止的行为，要求其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规定家庭应当教育引导未成年人科学、文明、安全、合理使用网络，预防和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例如，在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促进制度单元，立法非常典型地贯彻了自然亲权原则。《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1条要求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提高网络素养，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引导和监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教育、示范，并要求监护人应当合理使用并指导未成年人使用网络保护软件、智能终端产品等，创造良好的

网络使用家庭环境。这些规定，将父母对于促进未成年人子女网络素养的要求制度化、法律化，将原本以特殊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自然秩序，拟制为一种受到法律强制性约束的稳定的社会秩序。

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2020年）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出台，国家亲权理念进一步彰显，不仅确立了国家承担未成年人保护的亲权责任的主体地位，而且标志着国家亲权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领域真正超越了自然亲权。国家亲权原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国家是未成年人的最终监护人，政府部门需要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积极主动作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关于网络保护体制机制的设置充分地体现了国家亲权理念，有效解决了“谁来管”的问题。此前，学界对网络保护的一个批评在于执法责任主体不明确，存在“责任稀释困境”，经常出现网络违法行为“没人管”的现象。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长期缺乏明确的统筹部门，网络保护往往由网信、文化、教育、工信、公安等各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分头负责，未能形成科学明确的顶层制度设计，保护效果也有限。《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首次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了国家网信部门作为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的统筹协调部门，同时要求国家新闻出版、电影部门和国务院教育、电信、公安、民政、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并在网络素养促进、网络信息内容规范、网络沉迷防治等具体制度中进一步明确了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以压实监管主体责任。（2）当自然亲权缺位或者父母监护人不能有效保护未成年人时，国家以最终监护人的身份顶替其承担起监护和保护的职责，甚至为了未成年人利益可以以国家亲权干预或阻却自然亲权。例如，针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问题形势严峻、情况复杂，而很多家庭又无法有效解决此类难题，政府部门（国家）即积极发挥主导作用，通过立法设置“网络游戏宵禁”制度，明确网络游戏宵禁时间，规定“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不得在每日22时至次日8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将未成年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履行保护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职责。

（四）发挥技术治理手段的网络保护功能

在网络空间，技术性调整手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未成年人活动的网络空间具有鲜明的技术色彩，未成年个人信息保护、网络信息内容规范等全流程、各环节均有互联网技术的深度参与；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本身也会衍生出很多技术治理问题。因此，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的设计过程中，辅以相应的技术治理内容十分必要，以科学合理的方式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使用行为。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坚持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同步推进，通过技术手段提升制度实效，建构科学合理的治理框架，压缩保护制度跟进技术应用普及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由于技术发展速度快于制度本身而产生的“制度迟延”问题，实现了“以技治技”。以技术手段为依托的法律治理原则可被称为“以技治技”原则。例如，网络沉迷防治制度单元设计的“未成

“青少年模式”、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制度单元设置的身份认证制度、网络素养促进制度单元设置的未成年人上网软件保护制度等，都充分体现了“以技治技”原则。

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高度依赖技术治理，以构建保护未成年人的“青少年模式”（未成年人模式）。技术治理旨在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服务的管理，以便防止未成年人网络沉迷与违规用网，使网络更好地为其健康成长服务。2019年3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短视频平台为试点推动上线青少年模式，将防沉迷系统内置于短视频App中，引导家长及青少年选择使用。上网者进入青少年模式后，在使用时段、服务功能、在线时长等方面将会受到限制，且只能访问青少年专属的“内容池”。未成年人模式逐渐成为互联网平台的标准配置，成为保护未成年人尤其是防治沉迷网络的重要技术手段，并可通过立法成为一项制度化的强制性要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选择适合未成年人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则针对未成年人易于沉迷的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领域，明确要求相关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置未成年人模式，在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等方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提供相应的服务，并以醒目便捷的方式为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提供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安装上网保护软件也是利用技术手段强化网络保护的典型做法。中国2009年曾通过“绿坝”软件探索网络保护的技术治理，但很快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除了当时技术条件尚不成熟外，最主要的是“一刀切”式的强制安装要求不够合理，想要通过一款技术软件解决所有内容规范问题，不具有可操作性。在总结“绿坝”软件的教训后，中国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制定过程中，做了更加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摒弃直接要求强制预装上网保护软件的做法，采用了“引导+选择”的方式，明确了未成年人上网保护软件的管理要求：一方面，规定学校、社区、图书馆等为未成年人提供上网服务的特定场所，应当采取包括安装上网保护软件在内的必要技术保护措施，为未成年人提供上网指导和安全、健康的上网环境；另一方面，要求智能终端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应当在产品上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或者以显著方式告知用户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的安装渠道和方法。上述规定虽然要求采取必要的技术保护措施，但不限于安装上网保护软件，更不限于安装某款或某几款特定的上网保护软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网络内容处理的技术服务市场。智能终端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不仅可通过预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提供相应保护，而且可以通过显著告知安装渠道和方法等方式豁免预装义务，这有助于妥善处理未成年人保护和市场化经营之间的冲突。《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还进一步细化了相关技术治理规则，要求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专门供未成年人使用的智能终端产品应当具有有效识别违法信息和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便于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等功能，鼓励和支持研发、生产和使用专门以未成年人为服务对象、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规律和特点的网络保护软件等网络技术、产品、服务；国家网信部门还会同有关部门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专门供未成年人使用的智能终端产品的相关技术标准或者要求等。

(五) 以网络平台为规制重心推动多方共治

在中国互联网治理过程中，通过立法手段持续强化关键主体的法定义务的“管主体”思路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监管思路。近年来，平台化成为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重要主体。随着大量网络平台的产生，平台企业成为新的生产交换关系的主体和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超大型平台企业崛起已经在推动经济社会的资源重组和权力重构；从治理的角度看，那些对市场“具化”程度越高、占据信息优势越多的平台，应该属于受到更多治理关注的主体。实践中，平台企业被要求承担的法律责任在世界范围内呈现趋严趋重的态势，越来越多的互联网治理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平台应当承担更多的主体责任，部分网络细分领域的立法甚至规定了大型互联网平台或者重要网络平台的特殊义务。例如，中国2021年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首次规定了大型互联网平台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特别义务，该义务也被称为“守门人”义务；该法律第58条对于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规定了四项具体必须履行的特别义务。

当前，网络平台也正在成为未成年人网络活动的最主要空间。《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指出，视频、短视频平台已成为当前未成年人获取新闻事件、消息的主要渠道之一。由于每个平台本身就是一个网络社区，平台服务提供者在建构网络交往互动空间的同时也必然应承担起网络社区治理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互联网平台尤其是大型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在提供服务过程中的起始性、主动性以及技术水平和强势地位，平台应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采取更为积极主动举措，承担更切实有效的网络保护义务，为实现强有力的网络保护提供优化解决方案。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应将网络平台作为规制的重心，抓住大型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这类关键主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守门人”制度移植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领域。《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20条确立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守门人”制度，对于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或者对未成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响的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以下简称大型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提出了定期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影响评估、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合规制度体系、提供未成年人模式或者未成年人专区、制定专门的平台规则、每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等六项特殊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社会各方面要切实做好与儿童事业发展有关的各项工作”“全社会要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平台虽然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也并非唯一主体，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涉及政府、家庭、学校、企业等各个方面的职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明确提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应当实行社会共治，在将平台作为网络保护规制重心的同时规定了政府部门和学校、家庭、行业组织、新闻媒体等相关各方主体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中的责任。对于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强相关的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个人信息处理者、智能终端产品制造者和销售者等企业主体，《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要求其履

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承担社会责任，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监督检查，建立投诉、举报渠道并及时受理和处理公众投诉、举报；立法同时在上网保护软件、未成年人模式等相关制度中进一步规定了上述主体各自的网络保护责任，推进多方共治和综合治理。

四、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检视与改进

（一） 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功能优势

以《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为核心，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补充的中国网络保护法律体系，其制度内容涵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各环节、各方面、全流程，不仅有效满足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实践需要，而且与中国网络空间治理整体思路高度契合，体现出积极发展与消极保护并重、制度延续与立法前瞻并存、国际共性与中国特性兼顾的网络时代品格，并在全球范围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在制度建设方面居于较为领先的地位。

一是以体系化法律制度有效应对体系化网络风险。网络立法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更应当体现实践问题导向。未成年人所面临的网络风险日趋多元化，涉及内容风险、接触风险、行为风险等多方面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有效治理，有赖法律文件之间、制度单元之间的相互配合，共同构筑系统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体系。从纵向来看，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了定位明确、上下有序、各司其职的格局，贯彻了下位法遵循上位法的基本原则，构筑起了统一协调的网络保护规范。比如，法律层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上位法的主要功能定位是顶层设计，确立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主要制度和基本原则，解决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面临的共性问题；《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下位法主要是对上位法律规定的细化落实，重在解决诸多个性问题。从横向层面来看，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促进制度、网络信息内容规范制度、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制度和网络沉迷防治制度四大单元制度，基本覆盖了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主要领域；各制度单元之间通过关联互动、有序配合，共同搭建起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

二是实现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与中国网络治理的深度融合，并通过网络保护法律制度构建推动中国网络法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的重视上升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一方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是依法治网的重要方面，中国网络法治建设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除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未成年人保护专门立法外，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诸多互联网专门法律法规中，也从网络角度将未成年人群体纳入保护范围。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国家亲权等原则理念，其影响范围已超出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对中国网络空间治理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在网络生态治理方面，监管部门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作为开展相关工作的合法性、合理性基础，在个案中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处理相关网络治理工作，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国家亲权的职责，开展“护苗”、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等行动，围绕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沉迷网络游戏、网络不良社交等问题进行重点整治，在营造未成年人安全网络环境的同时，也实现了网络空间生态治理的目标。

三是实现了网络空间中未成年人积极发展与消极保护并重的理念优化。依法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重要目的是促进未成年人充分享受数字红利、在网络空间全面发展。近年来，随着网络保护立法进程的加快，中国逐步确立了以发展和保护并重为引领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理念。一方面，坚持积极发展，尊重未成年人“网络原住民”的客观成长规律，通过制度保障最大化地赋予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发展机会。《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肯定了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则将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作为立法的首要目的，并在诸多具体制度上坚持以服务未成年人为中心，体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福利法化”的思路。例如，网络素养促进制度，注重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上网权，要求政府部门加强公益性上网服务设施建设，改善未成年人上网条件，文化馆、青少年宫等为未成年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设施的场所应当通过安排专业人员、招募志愿者等方式，为未成年人提供上网指导和安全、健康的上网环境。再如，国家鼓励和支持研发、生产和使用有益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技术、产品和服务。国家通过这些举措，积极帮助未成年人充分利用互联网带来的资源和发展机会，更加有效地促进未成年人成长。另一方面，立法坚持消极保护，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和网络空间的规律和特点，最大限度减少和控制未成年人面临的网络社会风险，防止未成年人权益遭受侵害。网络信息内容规范、网络沉迷防治等制度，明确要求相关主体安装上网保护软件、合理设置时间功能权限、科学分配各方主体责任，有效实现了预防网络欺凌、阻隔违法不良信息、降低网络沉迷等基本目标。立法还将防治网络欺凌制度作为网络信息内容规范单元的重要内容。《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未成年人实施网络欺凌，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进一步要求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预警预防、识别监测和处置机制，设置便利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维权的功能、渠道。

四是坚持制度继承与创新并重，收到了协同立法的效果。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经历了一个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过程，涉及诸多法律规范和制度规则。为此，立法须处理好新旧法之间、新制度设计与既有规定之间的关系。为实现网络保护法律整体的协同性、连贯性，中国在相关立法中坚持继承与创新并重，将不同层级的法律制度有效地衔接起来，同时又根据发展形势和实践需要创新制度设计。其一，对于现行法律已有规定但制度设计较为原则的，立法者通过下位法细化具体规定；对于立法已有规定但立法层级较低，则通过在高位阶法律中的规定提高其法律效力。例如《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设置“个人信息网络保护”专章，一方面细化落实了《未成年人

保护法》中关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另一方面，将部门规章《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中收集、使用、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有关规定上升为行政法规。其二，对于实践中已有成熟做法或成熟管理制度的，立法沿用现行制度并通过法律形式予以固定下来。例如，对于实践中未成年人模式的管理要求，《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在短视频App行业上线试行的基础上将其确立为一项法定制度。这样的处理方式，既能填补空白、完善管理，也尊重了现行实践管理的做法。其三，对于存在立法空白的，立法者创造性地设计了相关制度。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国家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要求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通过该认证系统等必要手段验证未成年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

五是凝聚全球互联网治理共识，贡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世界各国互联网治理的共性难题。从全球发展趋势来看，通过制定或修订法律政策不断强化网络保护要求、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例如，日本修订《青少年互联网环境改善法》限制未成年人接触网络不良信息等；英国信息保护专员发布《适龄设计：网络服务实践守则》，对收集和使用儿童在网上产生的个人数据进行特别规制。中国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积极履行公约责任，不仅借鉴国际社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治成果，将儿童最大利益等原则引入国内并进行本土化改造，重点提升网络素养、强化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防治网络欺凌，凝聚国际社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最大共识，而且立足中国国情，通过提出信息内容分类管理、网络保护“守门人”制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模式等创新制度。这些制度创新在提升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效果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在这一重要议题上贡献了中国方案，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的智慧和经验。

（二）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效果偏差

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已初步建立，但在整体法律规范体系和部分具体制度设计上，还存在一些缺憾和不足：

法律制度体系衔接协调互动不足

其一，法律规范层面的衔接不足。虽然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实现了不同层级法律文件之间明确的功能定位，但在纵向法律层级衔接和制度规定协调之间，存在不健全、不一致的情形。从纵向法律层级之间的衔接来看，法律、行政法规等上位法基本定型，对制度落地也做了统筹布局，但部分领域下位法的落实细化还有不足。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创设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定，包含哪些具体类型，如何进行提示等，在实践操作中尚未有明确的细则和标准。再如，《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因部门职责调整被废止后，相关部门尚未制定出台新的规章，导致规则适用的缺位。从横向法律规定来看，由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法律文件既涉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涉及网络法，既包括专门立法，也涉及相关立法，因此不同法律之间不可避免会出现规则

不一致甚至冲突的情形。例如，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同意能力上，《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整体上保持了一致，要求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即以14周岁为划分标准确立了监护人同意的“一重同意”制度，但这与《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存在差异；对于“8周岁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而言，虽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仍可能具备信息同意能力。因而，“个人信息同意”实际上存在除监护人同意外还须征得未成年人同意的“双重同意”要求。

其二，横向制度之间的协调互动不足。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实现往往横亘多个制度单元，是制度联动配合的结果，不能割裂片面地看待问题。例如，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虽主要归属于个人信息保护单元，但同时需要网络素养培养、网络信息内容规范等单元的互动配合；再如，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防治也不应仅仅是依赖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还须通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培育、未成年人网络活动信息的共享共治、全流程全链条监管等共同完成。虽然中国网络保护立法在制度设计时考虑到了制度单元间的联动，但仍然存在不同单元之间的互动协调问题。例如，网络沉迷防治制度单元与其他制度单元的配合仍不充分，防治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的前提是对未成年人年龄和身份的识别，但截至目前，中国主要在网络游戏领域建立了统一的电子身份认证系统，而在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网络文学等领域，如何准确识别未成年人的身份仍然存在一定的障碍。申言之，网络沉迷防治如何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相协调，如何与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制度单元联动配合，仍待健全。

具体制度的效果偏差与认识分歧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本质上是对未成年人这类特殊群体的利益给予“特殊、优先”考虑，但这势必会对其他主体权利义务带来影响；对未成年人的这种特殊、优先保护并不意味着没有限度，更意味着制度设计可以无视其他主体的利益。既有制度中的未成年人模式、网络保护“守门人”制度、网络游戏宵禁制度等网络保护制度的设计，虽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针对性，但也带有明显的法律试验主义色彩。这种法律试行的灵活性、变通性往往与机会主义、策略主义相伴随，可能导致在适用过程中事出权变，甚至产生异化的现象，导致效果偏差，引发公众质疑。

其一，未成年人模式、上网保护软件制度的实现过于依赖网络技术能力，忽略了技术治理的局限性。从功能上看，未成年人模式、上网保护软件等以技术手段为依托的法律治理在网络保护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未成年人接触违法不良信息风险，缓解了网络成瘾增长严峻形势，但其实践认同度却并不如预期。首先，技术治理的可靠性受到质疑，被认为存在“形式主义”的现象。例如，未成年人模式通常是基于身份认证采取限制时长、内容、充值等方式干预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行为，但在实际运行中，部分平台的未成年模式存在明显的技术漏洞，未成年人可以通过卸载重装、忘记密码、选择第三方账户进行登录等方式绕开时间锁和防沉迷功能，轻易破解未成年人模式设置的技术障碍。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短视频App青少年保护模式

观察报告》指出，未成年人只需在时间锁和防沉迷功能设定后输入密码解锁便可使用App，而绝大多数App无法辨别家长与未成年人输入密码的差别。其次，现有技术手段的治理模式主要是通过外部约束和外部需求引导，这可能会限制未成年人自我探索的主动性和可能性。未成年人模式通过设置内容池或未成年人专区等为未成年人提供网络产品和服务，上网保护软件则为家长和监护人提供时间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上述两种模式将选择权几乎完全交给他人行使，未成年人本身能够选择的空間非常有限，其对于网络空间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最后，技术治理的准确度存在不足。上网保护软件使用的内容审查和过滤技术主要有三种：根据事先拟定的“黑名单”断开特定的网站链接，通过“关键词”检索过滤相关内容，或通过分析网站内容的标签页过滤相关内容。但这些治理技术仍然较为粗糙，对信息内容审查精准度和针对性不足，可能导致部分合法内容被错误过滤，且易导致部分违法不良信息被轻易规避。

其二，网络游戏宵禁制度在执行中出现了异化现象，国家亲权干预的限度有待明确。网络游戏宵禁是以国家亲权为法理基础的网络保护制度，通过限制未成年人连续使用游戏的时间实现防治其网络沉迷的目的。中国立法上的网络游戏宵禁严格意义上说应当叫做“选择性宵禁”制度，通过采取“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将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的时间规定在特定的时间段。《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将网络游戏宵禁的时间规定在每日22时至次日8时期间，是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的。但该制度具体施行过程中似乎出现了异化的现象。2021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网络游戏服务，其他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该规范性文件将“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调整为“正面清单”，极大地压缩了可以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的时间，这种利用国家亲权职责近似“一刀切”地禁止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游戏的做法饱受争议。一方面，《通知》关于游戏时长时限的要求违背了制度设计的初衷，网络游戏宵禁不是为了“限制”未成年人，而是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确保其发展的权利，《通知》的规定不仅忽视了未成年人爱玩耍的成长规律，也侵害了其发展的权利。另一方面，《通知》的要求已远超过法律规定的“网络游戏宵禁”范畴，将防治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沉迷的责任近乎全部转嫁到游戏开发商、运营商，这种做法有失公允，同时还可能对游戏的产业性、文化性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增加网络游戏企业运营负担和额外开支。

其三，网络保护“守门人”制度可能推动平台主体责任无限扩大，破坏法律公平。从中国网络立法来看，立法规定平台责任严格化、多样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平台需要承担的法定义务范围日渐宽泛。欧盟从提出“守门人”构想到最终通过《数字市场法》确立该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讨论和征求意见的过程，而中国立法快速将其移植到本土，比欧盟更早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守门人”制度，并通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将该制度进一步引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领域。从适用范围和目的来看，

欧盟《数字市场法》建立守门人制度的根本目的并非只是保护个人信息，也未表明其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意旨，而是拟从市场秩序角度防止大型平台滥用优势地位形成垄断、限制竞争，从而损害欧盟数字市场环境、阻碍影响创新。中国互联网治理将“管好大型平台”作为重要的监管思路，体现在立法上就是持续扩大大型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守门人义务的范围。立法在网络保护领域引入“守门人”制度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优先保护、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制度可以无序扩张，无视其他主体的利益，无限增加其他主体的法律责任。平台“主体责任”比通常的角色责任更为严苛，平台企业不但要在事前和事中接受严密、细致的行为指导、限制与管控，而且在事后要为可能出现的负面后果善后乃至兜底。有观点认为，监管部门希望通过强化平台责任从而减轻自身的执法压力，但这种做法实际上有将政府部门应当履行的职责转移到平台的嫌疑。从法律责任种类设置以及处罚程度来看，相比于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守门人”制度不仅明确设置了多样的法律责任，而且处罚力度远远超过对一般主体违法行为的力度。《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8条虽然确立了“守门人”制度，但没有明确规定法律责任，当大型平台违反第58条规定时，《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法律责任条款难以被简单套用，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54条不仅明确规定了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罚措施，而且对不履行部分网络保护义务的严重情节并处5000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5%以下的巨额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或者停业整顿、依法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同时对企业高管人员处以罚款，作出任职禁止的处罚。

（三）完善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构想

当前，互联网技术持续发展，新的技术不断涌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仍需持续强化。立足实践和问题，可就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提出构想方案。

一是优化网络保护理念，以“发展”为目标，寻求各方利益平衡的处理方案。经过多年的系统推进，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已经具备了较为坚实的法律制度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从整体来看，现有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以网络风险控制为核心，基本解决了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安全保护问题。网络保护以发展和保护并重为引领，发展是保护的目标。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未来网络保护立法的重点应向“促进发展”适当倾斜，这不仅是为了适应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需要，而且是提升数字时代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必然要求。网络技能素养是数字时代公民的基本技能和国家间竞争的重要内容。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通过促进发展培育未成年人的网络技能素养是提升国家技术和人才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应寻求更加平衡的协调共治方案，在对未成年人权益进行特殊、优先保护的同时，兼顾成年人等其他群体的利益诉求，避免因噎废食；在将网络平台作为规制重心督促企业积极履责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监管、家庭教育、学校保护、网民自律等各方主体的作用，避免将网络保护义务集中在某一类或某几类主体上；在利用国家亲权干预、阻碍自然亲权强化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的同时，避免将国家亲权等同于国家责任，防止未成年人把网络保护变质为一种监管权力恣意行使的正当化事由。

二是完善法律规范体系，健全面向数字时代的网络保护规则。首先，要进一步完善网络保护的纵向法律体系，细化《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上位法相关原则的规定，弥补规则空白，加快出台重要的基础性配套法规文件，及时制定、修订网络游戏管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等部门规章，明确关于“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的概念范围、大型互联网平台服务提供者认定等具体标准，强化纵向法律体系上下互动，推动网络保护法律文件纵向体系的优化。其次，着力解决横向法律文件规定不一致、制度设计不协调等问题，做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关于未成年人信息同意能力法律适用与《民法典》行为能力制度体系的衔接协调，处理好《通知》规定的网络游戏宵禁时间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5条规定的时间不一致等问题。最后，强化横向制度单元之间的彼此联动，最大化发挥网络协同保护的效果。例如，网络信息内容规范制度作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核心制度，应加强与网络素养促进制度、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制度的连接互动。

三是调试相关具体制度，强化法律实施，提升网络保护效果。理想状态下，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应当符合网络空间全面保护的预期，但如前文所述，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部分制度在实施中还存在一些认识分歧和效果偏差，需要通过立法技术的调整予以纠正。对于未成年人模式、上网保护软件等技术治理的局限性，应坚持适度技术治理，引导提升技术治理的准确性和针对性，防止因网络保护而过度侵蚀未成年人权利的情形；同时应完善技术治理的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相关主体参与保护软件等技术治理工具的研发，切实提升技术治理实效。对于网络游戏宵禁制度实施中出现异化的问题，应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遵循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纠正“一刀切”式的做法。可结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47条规定的网络游戏产品分类及适龄提示要求，针对网络游戏的不同等级对宵禁制度进行高、中、低的等级划分，按照未成年人的成瘾系数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对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守门人”制度，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20条和第54条已基本定型，再就制度设计本身讨论修改不切实际，但仍可在大型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认定标准以及具体执法中对相关标准进行调试。合理界定“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对未成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响”的标准，避免将过多网络平台尤其是中小平台纳入规制范围；对于违法情节严重行为作出巨额罚款、暂停相关业务或者停业整顿等处罚措施时，应坚持比例原则，避免对平台经济发展造成过大的负面影响。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9cWvIgJBh-hQ7AekwNgqjQ>）

(二) 《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倡导及其实现》

(王贞会,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刑事訴訟法学和未成年人司法;

周梓睿,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刑事訴訟法学。)

【摘要】近年来数字权利领域的理论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但在数字权利范围内以未成年人为研究主体的关注和讨论却相对较少。数字场景对权利的内涵及其运行方式均带来较大变化, 基于未成年人在主体特征和权利需求上的特殊性, 有必要将未成年人作为数字权利领域中的特殊主体进行定向讨论。在数字时代背景下, 应当关注未成年人对数字发展成果的共享共用, 正确看待未成年人使用网络、面对智能化和参与数字发展的价值意义, 从权利享有、权利参与和权利保护等维度来界定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基本范畴和构建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制度体系。应当将数字权利确定为未成年人权利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增强面向未成年人的数字资源供给, 保障未成年人的数字参与, 完善和落实未成年人数字权利保护机制, 从而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实现。

【关键词】 未成年人 数字权利 儿童权利公约 网络保护

一、引言: 沉默的未成年人数字权利

随着信息科技和数字化技术快速融入日常生活, 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红利共享、数字权利保障等领域的理论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这场有关数字权利、“数字人权”的理论探讨为数字时代的权利保护与人权发展研究贡献了诸多智识成果, 回应了数字时代的权利保障需求。与此同时, 自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以下简称《未保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以来, 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和司法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整体格局迎来了新发展, 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体系得到进一步巩固, 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也得到了更加深入的推进与更加全面的落实。《未保法》顺应了数字时代互联网发展的趋势, 增设“网络保护”专章, 从明确各方责任、全面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加大网络沉迷防控力度、优化网络欺凌处置机制四大方面健全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1]。

但是, 以限制未成年人的数字权利为主的现有制度设计难以满足未成年人的数字需求[2]。未成年人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 从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网络支付、在线学习到网络游戏, 数字产品和数字化的世界, 是未成年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深刻影响着他们的学习、娱乐和生活方式。我们应当关注未成年人对数字发展成果的共享共用, 正确看待未成年人使用网络、面对智能化和参与数字发展的价值意义。此外, 虽然现有规范设置并强调了各方在具体数字场景中的保护责任, 有效疏解了当前未成年人数字保护的重点与难点问题, 但也难免“挂一漏万”。因此, 我们需要构建一个统领性的概念框架, 达成价值观念上的共识, 并进一步将这一框架细化为具体的权利内容, 以便更全面、系统地保障未成年人在数字时代的权利。因此, 发展与完善关于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理论研究就具有了不可忽视的紧迫性。然而, 当前有关数字权利

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未成年人主体的特殊性，相关系统性研究尚显不足。有鉴于此，本文旨在界定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基本范畴，分析、明确当前未成年人数字权利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尝试提出保障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实现路径。

二、 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理论阐释

构建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概念框架，首先需要厘清现有数字权利的理论发展。通过明确数字权利中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可以更准确地判断未成年人群体是否应作为数字权利领域中的特殊主体进行定向讨论，并进一步分析未成年人在数字时代的权利需求，为构建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概念框架探寻理论基础。

（一） 数字权利的理论发展

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人类迈入了数字时代，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生产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数字样态的传统权利与依托于数字时代产生的新型权利均面临着侵害，出现了数据隐私泄露、数据监控、算法歧视、数字鸿沟等问题。为了有效应对“数字权力”对公民权利的潜在威胁，加强对公民数字权利的保障已成为数字权利理论研究领域的普遍共识，数字权利的理论研究也越发受到重视。

从宽泛意义上来说，数字权利指个人在数字社会享有的、与数字技术使用相关的一套独立的新兴权利，其权利内容是个人对大数据、算法、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应用的自由及自主性利益[3]。在数字权利体系中，“数字人权”占据基础性、中枢性和统领性的地位，被誉为这一体系的皇冠[4]，也吸引了众多数字领域和人权领域的研究者加入对这一概念的研究，在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与交锋。数字人权的支持者认为，智慧社会背景下的传统人权与新兴人权面临信息技术飞跃式发展带来的挑战，严重地损害了各项基本人权，因而人权观念也需要建立在数字化的“信息人”基础上，进一步确立“数字人权”的理念[5]。反对者认为，“数字人权”不符合“人的尊严”标准和“最低限度基础性”标准，归入人权可能导致权利位阶的混乱[6]；并指出，为对抗信息爆炸、数字化危机和知识权力宰制而主张建立“数字人权”实则是一种“人权工具化的理论方案”“数字人权 范畴内的诸多权利只是人权的数字化，“数字人权”的概念属于人权主体与主体人权的泛化[7]。另有论者从安全、尊严、平等三个价值角度，论证了“数字人权”的人权属性，并指出“数字人权”无论是在域外还是在我国均已具有基本权利属性[8]。讨论至今，“数字人权”的概念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但无论持何立场，有关数字人权的研讨日渐深入，“已逐渐从概念证成、价值宣示和话语传播，转向对于 数字人权，实在化的讨论。”[9]这场关于“数字人权”概念的学术争鸣极大地丰富了数字时代人权理论研究的内涵，也为数字权利的研究贡献了诸多宝贵的智识成果。

（二） 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理论定位

探讨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理论定位需要把握两组关系。一是未成年人数字权利与数字权利的关系，即未成年人是否具有显著的特殊性，需要作为数字权利领域中的特殊主体进行定向讨论。二是未成年人数字权利与“数字人权”的关系。前已述及，

在数字权利领域讨论中，“数字人权”是一个核心议题，产生了最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厘清未成年人数字权利与“数字人权”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潜在差异，尤其是未成年人群体与“数字人权”中所探讨的“数字弱势群体”的关系，是明确在“数字人权”范畴之外专门为未成年人数字权利开辟一片理论空间是否具备必要性的关键。

未成年人属于数字时代的特殊群体，需要作为数字权利领域中的特殊主体进行定向讨论。一方面，这种特殊性体现在未成年人的生理与心理上。越来越多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指出，青春期是大脑持续生长和变化的时期，负责高级的认知活动以及放弃即时的本能反应而倾向于采取更具策略性选择功能的“前额叶皮层”[10]，是大脑最后成熟的区域之一[11]。正是因为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他们往往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以及对特定行为潜在负面后果的预期。同时，随着未成年人触网时间的“低龄化”趋势愈发明显，未成年人群体更加容易受到数字技术的负面影响，面临着愈发严峻的数字技术侵害风险。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未成年人甚至可能无法感知到自身的数字权利正遭受侵害。

另一方面，这种特殊性也体现在对未成年人所采取的保护策略上。网络保护是数字保护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未保法》确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要求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并且，针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未保法》将原有的“四大保护”升级确立为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相互融合、协同发力的“六大保护”，形成了未成年人保护的整体格局。2024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是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领域的第一部专门性综合立法，其进一步将实行社会共治作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原则之一，明确了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平台的责任与保护义务[12]。可见，未成年人数字权利保护的责任体系呈现出多元化和协作化的特点，涵盖了国家、数字科技企业、政法机关、政府相关部门、群团组织以及社会各界力量等多个责任主体，并要求这些责任主体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共同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数字环境。

当前对数字人权的讨论尽管与未成年人数字权利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数字人权”的理论范畴尚未全面涵盖对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特殊保护。首先，从权利核心来看，“数字人权”内部整合旨在将以自主性为“圆心”的价值图谱插入技术的目的之中，即“自主性”是“数字人权”的核心标准[13]。但基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与保护策略的特殊性，其“自主性”至多是一种“有限的自主”。未成年人的“自主性”不仅不可避免地与监护人的家庭监护职责产生冲突，还将受制于“国家亲权”原则下国家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责任与权力。其次，从权利内容来看，在“数字人权”的广泛讨论中，“网络接入权”的普及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进而衍生出对“数字鸿沟”“数字弱势群体”等保障人们享有普遍、公平地获取数字基础服务的重要主张。目前“数字弱势群体”被区分为“显性数字弱势群体”和“隐性数字弱势群体”。前者以老年人、生活在边远贫困地区的居民和教育程度低的公民为预设对象；而后者则特指那些因缺乏基本数据权利意识和相关能力，在获取、

分析和运用数据信息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14]。“数字弱势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论及了未成年人相关权益问题，更确切地说，“数字弱势群体”与未成年人群体属于交叉关系。其中，部分生活在边远贫困地区的未成年人和教育程度低的未成年人的确属于“显性数字弱势群体”，但“显性数字弱势群体”的主要预设群体并非未成年人，两个群体在数字时代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也有所不同。至于“隐性数字弱势群体”，未成年人同样具有能力和认知上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体现在权利更易受侵害与权利意识薄弱上[15]。但一方面，隐性数字弱势群体的主体范围更广，不单限于未成年人，每一个缺乏基本数据权利意识和相关能力的公民都有可能是“隐性数字弱势群体”；另一方面，尽管倾斜保护原则在“隐性数字弱势群体”与未成年人群体的保护策略中均有体现，但二者在保护基础、内容和目标上却存在显著差异[16]。同样，针对“隐性数字弱势群体”的保护方式也无法完全覆盖对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特别和完整保护。换言之，在未成年人数字权利保护中，“数字弱势群体”的视角固然重要，但也只是未成年人数字权利保护中需要关注的视角之一。倘若我们仅在“数字弱势群体”这一领域来探讨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保护，则无法全面满足未成年人在数字环境中的权益保障需求。

最后，从权利基础来看，“数字人权”是人权代际理论在数字时代的发展。人权代际理论在以《世界人权宣言》为代表的国际人权宪章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它区分了不同代际的人权，并确立了“人之所以为人”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作为第四代人权的“数字人权”强调，数字科技企业利用技术优势在数字空间中形成了“公权力一私权力私权利”的三角结构，因而需要对其课加“数字人权”的尊重与保障义务[17]，即通过树立“数字人权”从而扩张义务及责任主体，进而限制“数字权力”而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则为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制定了独特且专门的权利保障。这一划分显著地反映了一种普遍观念，即儿童被视为“尚未完全成熟”和“相对依赖”的群体，与成年人分属根本不同的两类群体[18]，需要特殊的保护与协助，这种普遍观念也深深影响了全球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特殊的保护与协助策略。换言之，长期以来，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在权利需求和权利基础上存在根本不同，进入数字时代，这种差异也并未消弭，甚至愈发显著，我们无需局限于现有的“数字人权”理论框架来探讨未成年人的数字权利。因此，有必要对未成年人的数字权利进行专门的理论关照，也理应结合数字时代的权利发展需求，为未成年人量身打造一套适应其特殊性的数字权利保护体系。

（三） 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内涵界定

《儿童权利公约》是儿童权利保护的宪章，它对儿童权利保护的基本原则作出了系统、全面的规定，标志着儿童保护的理念与方法从福利导向转向了权利范式[19]。在数字化快速发展的当下，《儿童权利公约》对于构建和完善未成年人的数字权利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首先，《儿童权利公约》为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构建提供了一个重要框架，它强调了儿童的基本权利，如发展权、受保护权以及参与权等，

这些权利在数字时代同样适用，为我们全面而深入地保障未成年人数字权利提供了权利支撑和理论指南。其次，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构建未成年人数字权利，同样是对公约在数字时代之价值的深化与延伸。数字环境的特殊性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和解读《儿童权利公约》中赋予儿童的权利，来确保这些权利能够在数字时代得到有效实现。最后，我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一直积极履行公约规定，致力于推动儿童权利保护事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构建未成年人数字权利也是我国积极履行《儿童权利公约》的体现。

对于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概念内涵，我们应当紧紧围绕《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实质性权利，聚焦于提供（Provision）、参与（Participation）和保护（Protection）这三个核心维度，从权利享有、权利参与和权利保护来界定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基本范畴，为未成年人打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数字环境，确保他们在数字时代能够充分发展并行使自身权利。其一，应当提供涉及未成年人在数字时代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数字资源和信息。这包括在数字时代鼓励大众传播媒介传播和普及有益于未成年人的信息、资料和著作（第十七条），提供残疾未成年人在数字时代应享有的特殊待遇、教育和照管（第二十三条），数字受教育权（第二十八条），提供未成年人享有适合其年龄的数字娱乐和休闲的机会（第三十一条）等。其二，应当保障未成年人在数字时代的参与权。这包括未成年人有权在数字时代影响到他们的一切事项上发表意见（第十二条），在网络上的言论自由（第十三条），在网络上获取信息和资料（第十七条），从事与未成年人年龄相宜的数字游戏和娱乐活动的权利以及在网络中自由参加文化和艺术生活的权利（第三十一条）等。其三，应当保护未成年人在数字时代的权利不受侵害。这包括保护未成年人在数字环境下的隐私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防止数据隐私泄漏、数据监控，避免网络欺凌（第十六条），保护未成年人不受不良信息的负面影响（第十七条E），防止网络性剥削和性虐待（第三十四条）以及遏制其他有害未成年人福利的网络剥削、数字歧视（第三十六条）等。

三、 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实现障碍

在《儿童权利公约》的基础上构建未成年人数字权利，有利于为未成年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数字空间。然而，当前确保未成年人在数字化时代充分发展并行使自身权利仍然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

（一） 数字资源供给不足

在我国未成年人群体视野下，“网络接入权”并非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指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已基本见顶、城乡网络接入鸿沟基本消弭”。然而，面向未成年人的数字资源供给却极为不足。例如，真正成熟且专为未成年人设计的互联网平台寥寥无几，这导致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共用相同的互联网平台。近年来，在国家网信办的推动下，部分互联网平台推出了“青少年模式”“未成年人模式”，但由于这些互联网平台最初并非将未成年人作为目标用户群体进行开发，“青少年模式”“未成年人模式”更多是

一种限制网络沉迷与消费打赏的权宜之计，因而这些平台往往缺乏内在动力进行持续的建设和维护。这就导致“青少年模式”“未成年人模式”在内容层面暴露出显著不足，在实际使用体验上也存在诸多漏洞，难以真正契合未成年人休闲娱乐的数字需求。

（二） 数字参与权受限

未成年人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过度限制未成年人的数字活动，会极大地束缚他们在学习、娱乐、社交等方面数字能力的探索与发展，可能导致他们无法充分利用数字资源和信息，错失数字时代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阻碍他们在面对安全风险时自主抵御能力的培养。主流公众话语普遍聚焦于数字环境对未成年人成长的潜在威胁，然而这种单向度的观点往往催生保护主义心态，进而强化了父母在限制未成年人数字活动方面的绝对权威。与此同时，这种片面观点也会推动家长式的网络安全、数字安全的立法和政策不断出台[20]。另外，鉴于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所承担的监护、教育职责，在现行法律体系中，立法者预设了监护人、管理人与未成年人之间“利益一致”，也正是基于这种“一致性”，监护人、管理人被赋予了广泛的实体权利[21]。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例，该法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时，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即强调了监护人、管理人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和责任。然而：在数字时代，监护人、管理人与未成年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性”正日益受到质疑，家长替代未成年人表达同意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也受到了诘问。换言之监护人的家庭监护职责与未成年人参与数字时代的网络“自主性”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如何在保障监护人有效履行监护教育职责的同时，又确保未成年人在数字时代的有效参与，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 信息安全风险突显

1、不良信息侵害风险

不良信息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影响到未成年人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不良信息，二是误导未成年人的错误信息。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网络不良信息已成为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因素[22]。另外，误导未成年人的错误信息在互联网中尤为泛滥。需要注意的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加剧了网络不良信息的传播风险。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近年来飞速发展，国内外均出现了较为成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利用了神经网络技术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度学习，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注定了其生成的内容可能存在谬误。未成年人对于人工智能产品中的风险辨别能力较弱，在人机交互中容易过度信任与依赖 AI 产品，其中潜在的伦理风险需要我们注意与警惕，以防对其身心健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23]。又如，在个性化内容推荐算法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通过算法大数据形成的“信息茧房”现象，进一步加深了未成年人对某些领域特定不良信息的了解与认识。大数据算法通过分析未成年人的浏览、搜索和互动行为，精准推送符合其兴趣的信息，然而这一机制在提升个性化体验的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未成年人在信息获取上的广度。人们在信息获取中

的选择性心理与人们已有的认知框架有关[24]，未成年人相较于具有大量既往知识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认知框架的成年人来说，更容易陷入“信息茧房”的困境，从而接触到大量与自己观点相吻合的谣言和极端观点等不良信息。这些不良信息在“信息茧房”内不断被强化和重复，可能导致未成年人对这些信息产生根深蒂固的认同，进而影响其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

2、数据隐私泄漏风险

未成年人的数据隐私信息既可能是他们在某些情况下主动提供的，也可能是在无意识中被被动收集的。就前者而言，未成年人通常不能意识到他们公开发布个人信息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即使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些风险，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信息发布习惯和遗留的历史痕迹，他们可能会持续面临隐私侵犯问题，从而产生一种对隐私保护的倦怠情绪。就后者而言，市场上不断涌现的针对儿童的监控产品，正持续储存着未成年人整个成长过程中的海量信息。例如，儿童智能手表已成为移动设备市场中的热门产品，父母可以通过相关联的应用程序随时掌控孩子的位置信息甚至是心情状态。通过数据化，关于未成年人身体和行为的信息被转化为一种生物资本形式，具有显著商业价值[25]。

进一步而言，海量数据被储存在不同规模、数量庞大的各类数字技术企业中，若这些数字技术企业未能建立起健全有效的未成年人数据隐私信息合规体系，可能蕴含着巨大的数据泄露风险，对未成年人的数据隐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随着算法识别和数据关联技术的不断进步，数据的信息还原能力逐渐加强，使得构建目标对象的数字画像并非难事。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大数据时代，越来越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开始收集、分析和使用未成年人数据，引发了未成年人的数字身份失控、隐私风险增加和潜在歧视倾向等问题，可能对未成年人造成比成人更严重和持久的不良影响[26]。从目前来看，我国对于未成年人数据隐私信息的特殊保护规定散见于《个人信息保护法》《未保法》《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中，明确了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数字科技企业应当履行的义务以及应当遵循的原则，但相关的合规制度仍存在合规文件零散、行政合规与刑事合规体系割裂等问题[27]，相关企业能否建立有效的预防性合规体系还未可知。

（四）网络侵害风险加剧

未成年人在深度参与数字世界的过程中，面临着多元的网络侵害风险。其中，网络性侵害风险尤为突出。网络性侵害包括接触型侵害与非接触型侵害两种类型。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未成年网民数量达到较高比例，互联网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渠道，发生在网络环境中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频繁出现[28]。据办案部门统计，近年来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呈现上升趋势，而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已经成为其中的重要类型。当数字技术被不法分子恶意利用时，未成年人面临的网络性侵害风险被显著放大。一是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构建和集成聊天应用程序。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根据输入信息和上下文内容生成响应，模拟人类对话，不法分子可

能会利用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定制个性化的“聊天话术”，从而更容易地获取未成年人的信任。二是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批量聊天。批量聊天使得不法分子能够以极低的成本迅速筛选出潜在的受害者，在短时间内与大量用户进行互动，通过智能筛选和识别，快速定位到那些容易受骗或处于弱势地位的未成年人。三是利用“AI 换脸”和“AI 换声”等虚假音视频技术，通过制造逼真的虚假内容来构建虚假身份，接近并诱导未成年人。不法分子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技术能够实现对图像、声音等多媒体内容的篡改和伪造生成高度逼真的虚假信息。对于认知和判断能力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言，这种深度伪造技术极大地增加了侵害行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辨别真伪变得尤为困难。

四、 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实现路径

在数字时代，人们无法完全脱离数字场景的应用。为帮助未成年人顺应数字时代发展的要求，有效实现数字权利，充分享受数字发展带来的技术成果，应当对未成年人数字权利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和积极倡导，将数字权利确定为未成年人权利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增强面向未成年人的数字资源供给，保障未成年人的数字参与，完善和落实未成年人数字权利保护机制，从而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实现。

（一） 确立未成年人的数字权利

确立未成年人的数字权利主要分为两个层面。其一，从权利享有、权利参与和权利保护等维度构建统领性的概念框架并达成价值观念上的共识，是保障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域外对于未成年人的数字权利已经进行了广泛研究与深入探讨，但在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和讨论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更多的讨论聚焦于未成年人数字权利保护的某些特定方面或特定领域，属于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专门研究，如对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网络隐私保护等问题的探讨。聚焦于未成年人权利保护之特定领域的理论研究富有价值，也是我们全面构建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理论基石，但单一视角的专门研究未能从更宏观、更全面的角度审视未成年人在数字时代的主体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未成年人在数字时代中对数字发展成果的共享共用以及未成年人使用网络、面对智能化和参与数字发展过程中的价值意义和创造潜力，难以全面系统地探讨他们在数字时代所应当享有的数字权利。

其二，在达成理论共识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细化具体权利内容并构建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制度体系，确保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保障理念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权利规范。一是围绕未成年人数字权利保障需求，建立健全未成年人数字权利方面的法律规范体系。一方面，应当在现有法律法规基础上探索针对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专门立法，避免立法规定层级过低、内容不够全面和准确等问题[29]；另一方面，针对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专门立法应当具备前瞻性，能够预见并应对未来数字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挑战，能够有效限制数字技术的无序发展，防止其对未成年人造成潜在侵害。二是聚焦于未成年人数字时代应享有的权利，结合未成年人自身的特点对现有权利规范加以拓展与明确。例如，保护未成年人在数字时代的隐私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不受网络欺

凌的权利，可以转化为建立未成年人的被遗忘权等。未成年人属于特殊信息主体，通过设立未成年人被遗忘权，可以给予未成年人删除与其相关的负面信息的权利，通过消除不良记录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复归社会，并且有助于减少网络欺凌。

（二） 增加面向未成年人的数字资源供给

鼓励引导数字科技企业针对未成年人群体开发定制化的数字资源，增加面向未成年人的数字资源供给。相较于动画片、儿童读物等传统领域，面向未成年人的数字资源供给短缺严重。如前所述，未成年人可以利用的互联网平台往往依附于成年人。传统观念认为，电子游戏是专为未成年人打造的数字娱乐产品，但实际上，当前的电子游戏市场主要聚焦于具备高消费能力的成年用户，未成年人在使用上也受到了较大的限制。这些目标用户群体是成年人的互联网平台即便设立了“未成年人模式”，也会因为缺乏内在动力而没有进行持续的建设和维护。但是，针对未成年人群体开发定制化的数字资源，能够给予相关平台持续建设、优化的动力。由于未成年人的消费能力普遍受限，开发针对未成年人的数字化产品在短期内可能无法带来显著的商业效益，因而数字科技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开发未成年人数字化产品的动力。然而，满足未成年人的数字需求至关重要，从长远来看，未成年人也是未来数字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和消费者。为了激发数字科技企业对未成年人数字化产品市场的兴趣，相关部门可以在未成年人数字化产品市场发展前期提供更为显著的政策支持与激励措施，降低数字科技企业的开发成本和市场风险。另外，可以引导、鼓励数字科技企业依托于儿童智能手表等未成年人移动设备，积极建设专门面向未成年人的数字化产品平台。

（三） 保障未成年人的数字参与

保障未成年人在数字时代的参与，需要加强未成年人的数字素养教育与风险防范能力。学校是教书育人的主要场所，首先，学校应当加强在新兴数字场景下的技能教育和数字安全知识教育，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其次，学校应当培养、建设专门的数字素养培育师资队伍，通过课程活动、实践活动，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科学有效地开展数字素养教育与风险防范教育；最后，学校应当注重培养未成年人提出问题、深挖问题和准确描述问题的能力与批判性思维、验证性思维，引导未成年人学会利用数字工具并增强数字安全意识，对数字生活中常出现的内容风险给予足够的警示。另外，要加快出台关于专门供未成年人使用的数字产品以及对未成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响的数字服务提供者的相关技术标准或者要求，完善身份识别与监护人同意机制，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数字画像，推动建立信息分级分龄制度，同时强化行业内部的自律机制，为未成年人提供积极健康的数字空间。

保障未成年人在数字时代的参与，需要倡导家庭监护的合理界限。一方面，家庭监护缺位、监护不当等问题是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密切关联因素，在数字空间中也同样如此。家长不能缺位于未成年人的数字生活，面对数字化应用产生的一些新兴场景，家长需要提升自己的数字技能，做好引导者的角色，帮助未成年人识别数字风险、保护个人隐私，预防沉迷。另一方面，家长在履行监护职责的同时，要充分

尊重未成年人不断发展的数据自主权，保障未成年人数字参与权，避免过度干涉未成年人的数字生活，引导他们学会如何使用数字技术工具，帮助未成年人合理获取、利用数字资源和信息。

（四） 完善未成年人数字权利保护机制

推动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数字科技企业的合规建设。数字科技企业是未成年人数字权利保护的重要一环。数字生态的建设不仅依赖于健全的法律法规，更需要数字科技企业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来确保这些法律法规得以落实。数据隐私泄漏、数据监控、算法歧视等问题，需要从源头上进行严格的防范、监护并及时有效拦截。一是加快推动中小型数字科技民营企业合规，并向大型数字科技民营企业合规延伸，确保专门为未成年人设计的数字产品以及拥有庞大未成年用户群体或对未成年人产生显著影响的数字科技企业实现全面的合规覆盖。二是从治理性合规向预防性合规延伸，强调数字科技企业事前合规[30]，给予企业采取有效合规计划、建立有效合规体系的动力，并明确“晚合规不如早合规”的理念，严密监管并清理处置违法和不良信息，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的数字风险。三是从行政司法机关的外部合规治理向数字科技企业自身的内部合规管理延伸，使其持续性地在合规机制监管下运行，符合国家法律和法规对未成年人数字权利保护的要求。四是从刑事合规向行政与刑事一体化合规延伸，完善企业合规的行刑衔接，为整个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数字科技行业高质量发展及创造良好数字生态环境提供助力[31]。

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筑牢数字保护“防火墙”。近年来，未成年人司法领域日益强调“双向保护”的重要理念，不仅重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也强化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提升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精准度，帮助未成年被害人更快地回归正常生活。例如，针对我国未成年人数据隐私泄漏导致的违法犯罪问题，应当予以正厉打击，在打击治理犯罪的同时，要高度重视买卖未成年人数据隐私的关联违法犯罪，挖出违法买卖未成年人数据隐私的犯罪链条，堵住数据泄漏的源头。另外，《未保法》明确授权检察机关对侵害未成年人公共利益案件提起公益诉讼，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应当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公益诉讼法》的研究制定，为公益诉讼在未成年人数字保护领域的应用提供具体的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发挥公益诉讼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支持未成年人数字权利保护工作。

加强未成年人数字安全保护的国际合作未成年人数字安全保护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是全球公共性的问题，国际交流的频繁和网络的无国界性催生了针对未成年人的跨国网络犯罪的新趋势。如何在数字时代有效、全面地保护未成年人是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不仅需要各国独立采取措施，也需要国际社会协同合作，共同打击涉及未成年人的跨国网络犯罪。应当在《儿童权利公约》的框架下，加强未成年人数字保护国际合作，推进联合国网络犯罪公约的实施，持续加强与他国执法部门的国际警务合作，共同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数字网络犯罪，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

参考文献:

- [1] 宋英辉: 刘铃悦: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基本思路和重点内容》, 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0年第6期。
- [2] 苑宁宁: 《未成年人的数字权利保护逻辑》载《父母必读》, 2023 年第2期。
- [3] 罗有成: 《数字权利论: 理论阐释与体系建构》, 载《电子政务》, 2023 年第5期。
- [4] 张吉豫: 《数字法理的基础概念与命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2 年第5期。
- [5] 马长山: 《智慧社会背景下的“第四代人权”及其保障》, 载《中国法学》, 2019年第5期。
- [6] 刘志强: 《“数字人权”不构成第四代人权》, 载《法学研究》, 2021 年第1期。
- [7] 刘志强: 《“数字人权”再反思——与马长山教授等商榷》, 载《政法论坛》, 2022 年第6期。
- [8] 丁晓东: 《论“数字人权”的新型权利特征》, 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學學報)》, 2022年第6期。
- [9] 高一飞: 《数字人权规范构造的体系化展开》, 载《法学研究》, 2023 年第2期。
- [10] 米歇尔·德·哈恩 马克·H. 约翰逊: 《人类发展的认知神经科学》, 刘一 李红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165-167 页。
- [11] Johnson, S.B., Blum, R.w., Giedd, JN. Adolescent Maturity and the Brain: 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Neuroscience Research in Adolescent Health Policy,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009, (3)
- [12] 苑宁宁 吴则毅: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立法背景、思路与逻辑》, 载《少年儿童研究》, 2024年第2期。
- [13] 高一飞: 《数字时代的人权何以重要: 论作为价值系统的数字人权》, 载《现代法学》, 2022年第3期。
- [14] 宋保振: 《“数字弱势群体”权利及其法治化保障》, 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20 年第6期。
- [15] 高一飞: 《智慧社会中的数字弱势群体? 权利保障》, 载《江海学刊》, 2019 年第 5 期。
- [16] 顾秀文: 《数字弱势群体倾斜保护原则的证成与构建》, 载《时代法学》, 2023 年第5 期。
- [17] 龚向和: 《人的“数字属性”及其法律保障》, 载《华东政法大學學報》, 2021年第3期。
- [18] Lee, N. Childhood and Society Growing up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5.
- [19] Van der Hof, S. I Agree, or Do I: A Rights-Based Analysis of the Law on Children Consent in the Digital World, 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16, (2)
- [20] Choudhuri, A. Conceptualizing childrens Rights in Digital Spaces: Emerging Issues and Challenges, Socio-Legal Review, 2019, (2)
- [21] 李延舜: 《论未成年人隐私权》, 载《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5 年第6期。
- [22] 张振锋: 《网络不良信息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 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2017 年第 1期。
- [23] 倪琴贺樑王英英 等: 《人工智能向善: 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应用监管探研——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三)》, 载《电化教育研究》, 2023 年第8期。

- [24] 彭兰：《导致信息茧房的多重因素及“破茧”路径》，载《新闻界》，2020年第1期。
- [25] Lupton, D., Williamson, B. *heDatafied Child: The Dataveillance of Childre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ir Rights*, *New Media & Society*, 2017, (5).
- [26] 付新华：《大数据时代儿童数据法律保护的困境及其应对——兼评欧盟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2期。
- [27] 邵聪：《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的企业合规实践与制度完善》，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 [28] 魏红：《一切以未成年人优先——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政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4-63页。
- [29] 王贞会：《未成年人网络社交中的犯罪被害：风险类型与防范之策》，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 [30] 谢澍：《互联网企业刑事合规义务识别分层、复合与技数赋能》，载《云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 [31] 王贞会：《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构建》，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vCOeYXENUGZgIZGVamE_gQ）

三、各地司法实践

（一）《在虚拟世界里保护“少年的你”》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区委网信办、区市场监管局、区文旅局执法大队）

关注网络直播并打赏自己喜爱的主播、线上抽取虚拟盲盒卡牌、通过“氪金”为自己的游戏账号升级……近年来，为了追逐“情绪价值”，一些成年人在虚拟世界里“一掷千金”，他们从这样的网络消费行为中获得愉悦与满足。

然而，诸如此类的网络消费行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未成年人群体中，怎样管、如何管成为广受社会关注的问题。

今年1月1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是我国出台的第一部专门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旨在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近日，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区委网信办、区市场监管局、区文旅局执法大队，共同编制了全市首个《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以下简称“《指导清单》”），为互联网企业合法经营、营造未成年人友好的网络生态环境提供助力。记者也通过与检察官的对话，了解了这部《指导清单》出台背后的故事。

少年沉迷抽盲盒 为获得“隐藏款”实施盗窃

2023年底，普陀检察院接收到一条未成年人盗窃盲盒并销赃的线索：17岁的中学生小张在市区多家线下潮玩店铺盗取百余只盲盒，总价约6千余元，随后通过某潮玩APP将盗取的盲盒进行出售，并对赃款进行提现。小张盗窃的背后有更深的的原因，他有一款心仪已久的“隐藏款”盲盒，为抽这款盲盒屡次花光零用钱，却始终未能得偿所愿，这才铤而走险。

什么样的APP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办案中，检察官发现该潮玩APP是一个集盲盒潮玩、卡牌、剧本杀等产品的交易、讨论、直播于一体的新业态网络平台，用户超千万，并且以青少年用户居多，在学生圈里可以说是小有名气。据了解，小张也是该潮玩APP的深度活跃用户，曾在这个新业态的社群里，参与各种盲盒真假鉴定、直播抽奖等活动。“孩子为了集齐所谓的稀有款疯狂‘氪金’，而且APP上还有不少裸露的照片、不堪入目的回帖，有没有人能管一管？”一名家长对检察官说，不少家长也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在2022年就发布了《上海市盲盒经营活动合规指引》，其中载明：盲盒经营者不得向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商品，应通过线上线下等不同方式确认监护人同意。“我们在办案中发现，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的问题比较容易引起纠纷，此前办案中也遇到过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外卖平台购买‘小马宝莉’‘奥特曼’等卡通形象卡牌所产生的纠纷。在现场调解的过程中，我们要求网络销售平台应告知商家遵守监护人告知义务，针对未成年人在网络平台购买盲盒的行为，也应通过网络认证的方式征得监护人同意。”普陀检察院蒲公英未检团队检察官助理李宜告诉记者。

拒绝“玩无止境” 给企业量身定制“体检”

“这个APP不仅在销售和提现等方面没有设置监管，而且连未成年人模式都没有，也就是说对未成年人没有任何时间限制、消费限制。”李宜指出，“这个平台还存在剧本杀可以随意‘拼车’的漏洞，例如有些剧本内容并不适宜未成年参与，但在该平台上，未成年人也可以‘上车’。”

“我们是初创公司，创始团队小伙伴都是IT背景，对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知识储备的确有所欠缺，不知道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应该怎么做。”在走访企业的过程中，企业负责人多次向检察官表达他们面临的困境。面对企业的迫切需求，普陀检察院联合多部门，围绕网络安全、网络消费、文化娱乐、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对该APP进行全面“体检”。对于发现的未设置未成年人模式、盲盒卡牌等消费保护不健全等5方面问题，提出14项具体治理建议，并于今年1月底对该企业送达检察建议和整改清单，得到了企业方面的积极回应。在4月底的“回头看”过程中，该APP面貌焕然一新，检察官还意外发现企业主动提高了自我要求。“现在没有法律法规要求线上购买盲盒或卡牌的买卖双方一定要实名，但企业主动要求买卖双方进行实名认证。”李宜补充道，“如果买卖双方含未成年人，则每日限额为不超2500元，家长也可以在此限额之下设置更低的限额。”记者了解到，整改后，该APP已增设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在该模式下，未成年人无法下单酒类、游戏账号等产品，非适龄剧本杀也无法“上车”。此外，在区委网信办的指导下，该企业实现了对网络信息的“人工审核+机器审核”双重过滤，即：网站上的不良信息先是通过机器审核进行初步过滤，存疑的信息再由后台人工进行二次审核，以此筛除不良信息。而对于近年来网络诈骗、隔空猥亵、网络暴力、信息泄露等“魔爪”时不时伸向未成年人的情况，检察官还对企业提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访问应设置最小授权、强化私密信息必要保护等要求，企业更是新增了未成年人投诉举报专栏，优先处理涉未成年人问题。

类比行业需求 为网络企业提供指引

“我们在办案中发现，其实不止这一家企业，很多新业态网络企业都存在类似问题，我们便以此为契机，整理了这本《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李宜介绍。为实现企业健康发展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叠加效应，普陀检察院联合相关行政单位，梳理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具有典型性、普遍性的风险要点，共同编制了《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

记者在这本《指导清单》中看到，检察官对《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相对应的规定进行摘取，如“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得注册直播账号。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征得监护人同意。（《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6条）”等，内容覆盖防沉迷设置、信息内容规范、个人信息保护等5方面18个类别，针对32条可能出现的事项提出一对一的指导建议。那么，造成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消费的原因何在？在采访中，检察官对记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一方面是因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缺失造成的，很多家长关心陪伴子女时间不足，把手机和平板电脑当作陪伴孩子的方式，长此以往，孩子沉迷于虚拟世界；另外一方面是由攀比或跟风心理造成的，同学们都会议论最近玩了

什么游戏、买了什么盲盒，因此他们的网络消费行为也会受到同龄人的影响。”李宜说。实现未成年人合理健康上网需要家庭与社会的步调保持一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家长一方面要给予关心和陪伴，给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另一方面要管理好孩子的零用钱，大人自己的手机、银行卡等密码也要保管好。”蒲公英未检团队负责人徐丽春表示，“同时，未成年人保护问题没有最低标准。各类网络平台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自觉履行互联网企业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义务，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治、企业自律、法律监督、人人参与’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格局。”

该项工作同时还被上海政法综治网、中国新闻网、中国青年网、上海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上观新闻、澎湃新闻、新民晚报、文汇报等十余家市级媒体宣传报道，获广泛关注。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fVuD8cRp1ZwR6JBSU2sCow>）

四、典型案例分析

1. 检察院依法监督

初中女生遭网暴致重度抑郁，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从网络风暴中拉起“坠落”的孩子重庆沙坪坝：支持起诉一起未成年人网络校园欺凌案

“我相信我很好。我以后会好好学习，我以后想做一名心理咨询师，帮助别人。”近日，在接受完心理疏导后，小兰拉着“莎姐”检察官的手认真地说道。

小兰是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院支持起诉的一起网暴案件中的未成年当事人，几年前，小兰遭受了网络欺凌，这让她一度陷入抑郁，身心受损。如今，小兰不仅在民事诉讼中胜诉，还解开了心结，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校园“表白墙”成为“欺凌地”

2021年4月，初中生小兰因与其他同学产生矛盾，同学小敏便匿名向校园“表白墙”发帖对小兰进行诽谤。该“表白墙”的管理者青青在未核实的情况下，将上述内容公开发布。很快，同学们对该条帖文议论纷纷，甚至“人肉”出了小兰的个人信息。

网上的跟帖和现实中的风言风语，让小兰不堪重负，身心疲惫，产生了厌学情绪，心理问题逐步显现并加剧，身体也出现了不适症状。

老师和家长只知道小兰身体不适，但对她的心理障碍并不知情，直到2023年的一次学生心理筛查。筛查数据提示，小兰心理异常。经医院诊断，小兰患上了重度抑郁。随后，小兰辗转多家医疗机构住院治疗。

2023年5月，在学校的建议下，小兰家人报警。公安机关侦查后，认为案件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且已过治安案件6个月的追诉时效，决定终止调查。

陷入迷茫的小兰一家在朋友的建议下，来到沙坪坝区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援助中心将该案转介该区检察院“莎姐”青少年维权岗。

“莎姐”检察官认真倾听了小兰家人的诉求，认为小兰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网络诽谤致重度抑郁，维权能力较弱，符合支持起诉条件。经小兰家人申请，沙坪坝区检察院决定依法支持起诉。

启动“未检+”办案机制协作破局

被告是谁？被告的真实身份如何确定？怎样才能最快消除影响，又能完整保存网络证据？诸多挑战摆在了检察官的面前。

承办检察官走访调查并初步梳理证据后，决定启动“未检+”办案机制，通过多部门协作，寻求案件办理的最优方式。

“公安机关虽然终止了调查，但仍进行了初步取证。”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承办检察官借力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系统，明确了小敏、青青等人的身份信息。

为固定“表白墙”上的侵权帖、评论、点击量、转发量等证据，承办检察官严格比对审判机关对电子证据的各项要求，依托“未检+检察技术”办案模式，由检察技术部门运用专业取证设备进行取证，取得的证据获得了法院认可。

要减轻诽谤帖文对小兰的负面影响，删帖势在必行。校园“表白墙”虽然冠以学校的名号，实则是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但管理者青青表示，自己已将管理权限转交别人，现已无权删除“表白墙”上的帖文，也不愿意联系新的管理员删除帖文。

对此，承办检察官依托“沙坪坝区网络保护法治工作站”，通过网信部门，与校园“表白墙”所在社交媒体管理员取得联系，推动社交媒体管理员删除了相关侵权帖。

推出反网络暴力法治课

在检察机关的支持下，2023年12月29日，小兰以名誉权遭受侵害，导致其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为由，向法院提起侵权民事诉讼。今年2月27日，法院审理此案，检察官到庭支持起诉，并发表意见。5月28日，法院判决小敏、青青以书面形式向小兰赔礼道歉，共同赔偿小兰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

卸下心结的小兰及其家人也在检察机关的协调下，积极接受妇联、卫健委开展的心理疏导和家庭教育指导，小兰的心理状况日渐好转，逐渐回归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中。

与此同时，针对未成年人网络校园欺凌问题，沙坪坝区检察院向区教委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区教委督促辖区学校完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和校园欺凌防控机制。“莎姐”检察官团队还精心制作了《祸起“校”墙》法治课，这节课作为该区的“开学第一课”，已于9月11日在沙坪坝区高滩岩小学网络首播，并将陆续与全区中小學生见面。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eAtrdRN2HyTNNCheKa6oxg>）

2. 法院依法裁判

以案释法 | 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案例一 侵犯未成年人肖像权、名誉权案

【基本案情】

乙某带着未成年子女甲某1在小区内活动时，与隔壁小区居民因物业管理发生口角，争执过程被被告丁某拍摄记录。视频中，乙某的体貌特征清晰，未成年人甲某1未佩戴口罩，面部清晰。丁某未经原告许可，向他人发布上述视频。被告丙某因个人存在类似物业纠纷，在微信群中看到了剪辑、加工后的上述视频后（包含对甲某1父亲甲某2的负面文字评价），未核实即将视频转载到多个网络平台。甲某1、甲某2、乙某认为丁某和丙某的行为构成对甲某1、乙某肖像权、名誉权的侵害，构成对甲某2名誉权的侵害，因此要求丁某和丙某向三原告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等。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视频由丁某拍摄并向他人传播，视频内容系乙某与邻居在小区中的争执。但视频并未完整地反应客观事实，主要是针对乙某的贬损。同时，该视频中，乙某儿子甲某1的面部没有遮挡，完整地暴露在争议视频中，乙某的体貌特征清晰，因此，丁某的行为构成对甲某1、乙某肖像权的侵害。该视频内容还导致了乙某社会评价的降低，构成了对乙某名誉权的侵害。丙某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了另外添加对甲某2负面评价的加工后视频，除侵害甲某1的肖像权，乙某的肖像权、名誉权外，还侵害了甲某2的名誉权。法院判决丁某向乙某和甲某1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丙某向三原告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一审判决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以案说法】

处理纠纷应采取合理方式，特别是不得未经同意在互联网上传播未成年人肖像。未成年人尚处身心发育过程中，一方面，成年人在生活中处理争议时要尽可能避免对未成年人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更要特别注意网络传播环境可能对未成年人造成的扩大性、持续性伤害。法院提倡，社会公众应提升网络空间中保护未成年人的意识，共同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fVuD8cRp1ZwR6JBSU2sCow>）

案例二 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充值案

【基本案情】

沈某某是一名未满11周岁的小学生，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其父亲的手机号在某游戏公司运营的网络游戏注册账号，并使用其父亲的支付宝频繁充值，累计充值3万元，单次充值金额有高达648元的记录。沈某某的监护人认为，沈某某作为小学生，充值的金额和消费的行为已经超过其民事行为能力范畴，应不产生效力，遂诉至法院，请求该平台返还充值钱款。

法院认为，沈某某作为未成年人做出的高额充值行为与身份、年龄和经济状况不相适应。法院在审理中发现，游戏平台账号实名认证形同虚设，违反了国家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要求。经广州互联网法院主持调解，游戏公司一次性向沈某某返还充值款项3万元。

同时，广州互联网法院还向游戏公司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游戏公司严格执行实名认证注册制度，规范网络游戏服务，有效遏制未成年人沉迷游戏、过度消费等不良行为。

【以案说法】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网络直播，超出其年龄、智力进行的非理性高额充值、“打赏”等问题需要高度重视。本案就审理中发现的问题向游戏公司发出司法建议书，促进游戏平台履行法定义务，强化社会责任，为公众提供健康有益的网络环境。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fVuD8cRp1ZwR6JBSU2sCow>）

案例三 针对未成年人网络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20年至2021年间，被告人黎某某、黎某（犯罪时未满十八岁）经预谋后，在快手、抖音等网络平台发布能够解除网络游戏设置的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的虚假信息，利用他人提供的收款二维码收取钱款，诱骗未成年被害人使用家长手机扫码转账，骗取被害人钱款。截至案发，黎某某骗取钱款八万七千余元，黎某骗取钱款一万五千余元。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黎某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黎某某、黎某作用较大，应认定为主犯。被告人以未成年人为作案目标实施诈骗，量刑时应酌情从重处罚。结合各被告人认罪认罚及退赃情况，最终判决被告人黎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

【以案说法】

本案是一起依法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典型案。开发未成年人防沉迷、青少年模式等管理系统是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举措。

本案被告人以解除网络游戏中的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为幌子，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不仅侵害了他人合法财产权益，也破坏了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屏障，对此人民法院在量刑时酌情予以从重处罚。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fVuD8cRp1ZwR6JBSU2sCow>）

案例四 针对未成年人父母的网络诈骗案

【基本案情】

未成年人李某玩手机游戏时，在网络游戏平台上认识了某网友，该网友以免费赠送游戏“皮肤”引诱李某加QQ好友，又要求李某用成人微信扫二维码领取皮肤。李某以其母王某的微信扫码后，该网友以王某微信违法、需要解除风险否则上门抓人为借口，欺骗恐吓李某又添加某“警察”的QQ。犯罪嫌疑人假冒警察，通过会议视频，欺骗诱导李某用母亲的微信扫二维码，完成多笔付款，包括在本案被告电商平台某店铺中下单购买的一笔4000余元的电子礼品卡。后李某父母报警，公安机关已经刑事立案。李某的母亲王某认为被告平台对用户及店铺的管理不当造成其损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被告认为，原告的损失是网络诈骗的犯罪分子实施诈骗行为造成，被告作为电子商务平台，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也履行了法定的对用户和商铺的注册审核义务，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导致王某财产损失的原因是其子李某被他人欺骗诱导，使用原告的账户为他人被告经营的平台内某店铺购买可即时收货并用于充值消费的电子礼品卡进行扫码支付。从刑事案件立案情况看，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及平台内店铺直接实施了侵害原告财产的行为。从被告履行对用户及平台内经营者义务的情况看，下单的用户完成了法定的注册程序，被告对平台内经营者的审核亦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之子下单支付的是即时送达的电子礼品卡，原告通知被告时，被告客观上已经无法及时阻断交易。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其子因遭受网络诈骗造成的财产损失，证据不足，于法无据，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审理过程中，被告表示已经对下单账号采取了相关措施，并愿意配合公安机关对相关账号的情况开展调查。

【以案说法】

法官提醒，未成年人遭遇网络诈骗后，家长等监护人应当注意采取合法、适当的途径维护权益，及时保存证据，向公安机关报警。家长应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教育，提高未成年人对网络不良信息、不法分子、诈骗行为的识别能力。网络服务提供者，特别是未成年人用户较多的游戏平台、网络社交平台等，应加大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审核力度，对用户加强关于违法犯罪行为的提示，不断提升未成年人保护力度。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fVuD8cRp1ZwR6JBSU2sCow>）

上海市律师协会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钱晓峰 张 雯 龚佳丽

委 员：（按姓氏拼音）

鲍殷豪 陈惠斯 陈秋言 陈 希 杜 晶 邓晓明 范俊峰 郭达丽 郭 慧
甘思明 黄洪连 黄路遥 姬晨楠 金 玲 计时俊 贾欣彦 罗海溧 林康明
刘 庆 卢启华 刘新艳 毛闻博 潘金骏 潘蕾敏 彭 涛 秦莉丽 宋成诚
孙曾利 孙凯哲 沈 玲 石 玥 申雨颖 屠江南 唐康萍 田云云 温会会
吴佳倩 吴祺桢 王婷婷 吴 颖 谢 颖 姚海涛 严瑾洁 阳洁兰 张 皎
朱 婧 周 忆

干 事：（按姓氏拼音）

端木英子 李 昂 苏晓丹 吴正红 俞 钧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律资讯》中所刊载的文章之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或者引用本文内容请注明来源及原作者。